

目 录



西安地方志

2010·第2期

(总第203期)

陕新出内印字 0057 号

内部交流刊物

工本费:10元

历代名人与西安

元代皇子忙哥剌在京兆建安西王府 (3)

学术交流

第二轮志书体例模式倾向思考(中) 王 晖(8)

再论众手修志 代代相济 永不断章

..... 杨忠诚 杨普社(11)

人物春秋

屈光 (13)

张德生 (14)

史料钩沉

古代周至进士考录(二) 任 升(15)

西安旅店行业发展漫谈 (17)

陕西商帮所创造的“历史第一”

..... 李 刚 广红娟(19)

1932年“虎烈拉”大流行 封五昌(23)

西安风情

西安古城墙之城墙典故(一) (24)

丈八沟的传说 雁塔区志办(26)

漫谈秦腔 (27)

石渠阁与司马 (29)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蒋村正月民俗活动 富小云(30)

文史拾趣

古人的洗浴工具 (32)

晚清礼仪:见不见客,门告诉你 (33)

毛泽东给儿子的书单 (34)

收容流民的栖流所 (35)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委员:王莹 张耀 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姚敏杰

副主编:张耀

责任编辑:王文竹 宋亚颖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二府街 27 号

邮编:710003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Ve.xdwy.com.cn/difangzhi

E-mail:zhangyao55@sohu.com

电话:029-87296801

“三顾茅庐”与“荆楚人贵”	(37)
这些古人姓什么	(39)
帽子的历史	(40)
名人读书趣话	(41)
老子的做人做事做官思想	(42)
古代文人的食谱	(45)
石显专权	(46)

志鉴动态

《西安年鉴》2009 卷获全国年鉴大奖	(47)
《西安年鉴(2010)》编纂工作暨培训会召开	(48)

知识窗

名片始于汉朝	(44)
巡抚与总督	(49)
“靠右行”始于何时	(49)
清朝名字之谜	(50)
台湾最早叫什么	(51)
“墨守”与“成规”	(51)
什么是真正的“吃素”	(52)
中国用红色表示吉祥的典故	(52)
唐人怎么“吃茶”	(53)
五黄餐与屠苏酒	(54)
何谓“高足”	(54)

理论研究

如何提高人口志记述深度的一点思考	(55)
------------------------	------

历代诗人咏长安

曲江二首(杜甫)	(56)
----------------	------

解字

“一”	(47)
“丁”	(48)

名句欣赏

“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等 5 条	(13)
----------------------------	------



安西王府位置示意图

元代皇子忙哥刺在京兆建安西王府

在今天西安东北方向胡家庙以北，东距浐河 2 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元代斡耳垛遗址，这里就是曾盛极一时的元代安西王府城的所在地。

元代设立安西王镇守长安

唐以后，西安城失去国都地位，一降而为区域重镇，但作为西北、西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仍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自宋至清，西安都受到中央朝廷的高度重视，纷纷派遣皇室成员和名臣大将驻守于此。

到了元代，1253 年，蒙古宪宗蒙哥汗大封同姓宗室，命皇弟忽必烈授封京兆地。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改燕京为大都。为了加强对西北、西南大片地区的统治，忽必烈于至元九年（1272 年）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

忙哥刺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正后所生的第三子，以“王性宽和，能受善言”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忙哥刺长兄早卒，次兄真金被立为皇太

子，所以忙哥刺在皇子中地位特殊。这与后来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分封次子朱棣为秦王，镇守西安极为相似。至元十七年（1280 年），忙哥刺的长子阿难答继承了安西王位。大德十一年（1307 年）元成宗病死，阿难答企图夺取帝位，引发了一场内乱。历时 37 年的安西王府在这次事件后虽未被废除，但长期无人承袭王位。16 年后，至治三年（1323 年），阿难答的儿子月鲁帖木儿袭封安西王，但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流放云南，不久被杀。至此，安西王这一封号仅延续三世。虽时间短促，但在此期间，安西王府成为安西王统辖西北、西南大片地区的冬宫所在地。

忙哥刺受封为安西王后，拥有一方螭纽（古印纽名。印章的鼻雕成螭形，故名。螭形有蟠螭、穿螭和子母螭等多种形式）金印。至元十年忽必烈又赐其秦王封号，再赐一块兽纽金印，并命令为安西王在长安和六盘山分别兴建安西王府和开成王府。安西王府为冬宫，开成王府为夏宫。由此，安西王就成为号称“一

●历代名人与西安●

藩二印,两府并开”的一方雄藩。长安城的重要地位无需赘述,而六盘山自从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就一直是蒙古军事贵族休兵牧马、养精蓄锐的大本营。

忙哥刺时,安西王府统辖地域广大,包括今陕西、四川、青海、甘肃、宁夏、西藏等省区全部,以及山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浐河西岸建造一座独立城池

元代安西王府位于今西安城东北约3公里,南距秦家街120余米,东距浐河2公里许,地势高亢而平坦,是龙首原东去之余脉。清代学者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记“安西王城”,称“在府城东北二十里,元世祖以子忙阿刺为安西王,开府京兆,镇秦、陇、蜀、凉之地,置城。今俗名鞞耳垛,故址尚存”。这一记述中不仅指明了安西王府的位置以及清代的残存状况,而且直接以“城”称呼安西王府,足见对其规模之大的肯定。“鞞耳垛”在蒙古、土耳其及通古斯语中是“宫殿、郭城或行宫”的意思。

安西王府选址于西安城东北的浐河西岸,占地规模较大,成为一座独立城池。这是对周秦汉唐故宫废苑经过审慎考察和踏勘调查,精心比较之后选择的结果。

首先,京兆府城区占地约5.2平方公里,难于容纳规模庞大的安西王府城。据1957年考古实测数据,安西王府城占地面积约为0.3平方公里,约为大城区的6%。若在京兆府城中建造城周4.5里或更大规模的宫城,势必要拆除大量民宅寺宇商铺等,迁徙居民,这在元代初年西南各地尚未平定的情况下,易激发

汉族、回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其次,安西王府与开城王府同时起建,从二者分别为安西王冬宫、夏宫的不同功能而言,安西王府选址于浐河西岸的平原地带,周边有众多川、河、湖、泉等水域,可调节温度、湿度,对于安西王府发挥“冬宫”的功能大有裨益;选在旷野平畴,水源充沛,兽禽众多的龙首原上兴建王府,不仅可避免激化京兆府城中的民族矛盾,而且王府地处郊区,周边环境景致颇佳,在利用浐河水源方面也极为便利。

再次,对于在元前期掌握重兵、治权崇高的安西王而言,在郊外建造安西王府城,周边驻扎下属重兵,城中附设有权力极大的王相府,这样不仅使得安西王府城与京兆府城、咸宁、长安二县城在空间上相互独立,在功能上也保持专属和专一性,而且可以更好行使安西王军事、政治、经济等权力,减少行政摩擦和干扰。

冬宫“傍水”,夏宫“依山”

京兆的安西王府与固原的开成王府相比,有两大区别:一是西安城东北安西王府建筑相对集中,建有高大墙垣保护,而开城王府建筑分散,占地广大;二是王府选址的地形条件有很大区别。开城王府位于坡地,各建筑之间似无规整的分布规律可循,也缺乏明显的中轴线,而安西王府位于浐河下游西岸的平原上,呈长方形,有明显中轴线。开城王府“依山”,而安西王府“傍水”,这与两者之间“避暑”、“越冬”的设计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正相吻合。

至元十年至十五年(1273年~1279年)六

年间，元军与南宋军队在四川等地仍处于交战状态。这一时期，六盘山东麓的开城王府直接控制着四川的战局。而到了战火平息之际，京兆安西王府在自然环境、交通区位、历史文化、商业贸易等各方面，其重要性都要远高于偏处一隅的开城安西王府。

马可·波罗笔下的安西王府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1275年抵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任官17年，游历几遍中国。回国后著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亦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

马可·波罗在元朝廷供职期间，作为忽必烈的专使，奉命巡视中国西部，考察各地的风俗民情和物产资源。1278年前后，他从元大都出发，经今山西大同、太原，西渡黄河进入陕西渭北。他在游记中留下了有关京兆府城和安西王府的珍贵记述。由于《马可波罗游记》有不同的译本，译文又多有区别，因而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摘录于此，读者可从中一窥安西王府的位置、规模、周边水环境、内部布设、军队驻防、射猎生活等状况。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载称：城外有王宫，即上述大汗子国王忙哥刺之居也。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哩。墙内即此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此忙哥刺善治其国，颇受人民爱戴，军队驻扎宫之四围，游猎为乐。

张星烺译《马可波罗游记》记云：城外有

忙哥刺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很厚很高的墙，周围五迈耳。建筑极佳，并设有统眼。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围墙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忙哥刺治国贤明，公平无私，人民很爱戴他，宫的四周有兵驻防，野禽、野兽，给他们许多娱乐。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则叙述说：离这座城市约八公里的一片平原上，有一个属于忙哥刺王的漂亮王宫。王宫内有许多泉源和小溪点缀着，此外还有一个瑰丽的花园，高墙环绕，上面筑有墙垛，方圆八公里，园中养着飞禽走兽，各类品种应有尽有，可以供王家尽情娱乐。花园的中央是这个宏伟王宫的所在地。构造整齐匀称，堂皇华丽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宫中有许多大理石砌成的殿堂和楼阁，装饰着图画，金箔并配上最美丽的天蓝色，所以，人民对他表示敬仰和爱戴。他也嗜好打猎和放鹰。

前述译文中载安西王府城墙长度为“五哩”，约合8公里，亦有“五迈耳”、“八公里”等表述。这与考古实测数据约4.5里出入较大，当属游记类文献未做实地测量，数据来源于听闻访谈所导致的。

城垣的平面呈长方形

安西王府占地规模较大，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解释“安西王城”称，“在府城东北二十里。元世祖以子忙阿刺为安西王，开府京兆，镇秦、陇、蜀、凉之地。置城，今俗名

斡耳垛,故址尚存”。“置城”当即指专为安西王兴建府城,而且有可能依据通行的“城池”标准加以建造。民国时人陈子怡在《西京斡耳垛考》中亦称“斡耳垛在当日既为一宫,且包兵卫在内,实即一宫城也”。1940年前后,西京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陈云路拟《西京规划》中载元安西王府“墙垣、殿基皆存,其周约四里”。

马得志先生在《考古》1960年第5期发表了《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详尽记述了1957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安西王府的勘测数据。

安西王府的城垣,除北城墙基保存较好外,其他三面均埋于地表以下。经钻探得知,城基均完整,全是板筑夯土,夯层坚硬平整。四面城基宽度不一致,北城基宽9米,西城基8.2米,东城基和南城基相同,皆10米。东西二城基南北长各603米,南城基542米,北城基较南墙略短,长为534米,周围2282米。城垣的平面基本呈长方形,方向北偏西3度。城的四角均向外突出,突出部分的平面近半圆形,直径在29米~30米左右,从其形制及附近堆积的砖瓦分析,城的四角可能有角楼一类的建筑。

根据钻探所知,安西王府城仅东、西、南三面有门,东西二门基本对称,二门大小亦相同,门基宽14米,都是一个门道,宽皆5米。南门略偏东,门基宽14米,也是一个门道,惟宽12米,较上述二门宽一倍多,这当是宫城南面的正门。

在城的中央,有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2~3米多。从台基上散布的大量砖块

和琉璃瓦推断,这一台基当是宫殿的基址无疑,而且是重要的宫殿。关于元安西王府中央大殿台基结构,夏鼐先生研究认为,“依照台基的平面和所处奠基石函的位置来推想,这台基上的宫殿,很可能是前后三进(编者注:古代宅院大小称‘进深’,是以纵向‘大厅’的数量计算的。‘三进’即由纵向的前、中、后三个厅组成),像北京故宫的三大殿”。推断安西王城中央台基的建筑结构与元大都大明殿一致。即前为朝会正殿,中为中殿,后为寝殿。

整个城址内的建筑遗迹并不算多,除中央大殿之外,东西两侧及其北面近城墙处有些小型的建筑残迹,此外多是空地。

安西王府在元末毁弃

元安西王的袭封时间并不长,从忙哥刺至元九年(1272年)封王起,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他的儿子阿难答被诛为止,前后仅三十余年。后来忙哥刺的孙子月鲁帖木儿于至治三年(1323年)袭封安西王,但很快就被流放云南,不久被杀。此后,由于不再有安西王居住于王宫之中,其衰废也就不可避免。《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与月鲁帖木儿为同时代人,在他绘制的元奉元城(即西安城)图中即称安西王府为“安西故宫”。但据《新元史》卷183《王思诚传》载,直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陕西行台侍御史王思诚还在安西王宫举行过会见官员的活动,表明安西王府在安西王不再袭封后仍得到地方政府的有效利用。由于在明代文献中未见有对安西王府城加以利用和维护的资料,因而可以推断,在元末变乱战火之中,安西王府城就已被完全毁弃。

安西王府对西安的影响

安西王府城垣的四角为外突的半圆形，这与元奉元城“圆角方城”形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先生在《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安西王宫城圆形角台的形制，对奉元城四个圆形城角的修建具有重要影响，两者之间有一前一后的源流关系。弄清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中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不同民族文化对于城市布局形式的影响。

自唐末五代以来，咸宁、长安两县县城分布在长安城外东、西两侧，与大城构成“子母互卫”形制，既能在军事防御上与长安城相互呼应，又使两县能各有驻防城池，彼此拥有独立城市辖区。至元代，奉元城东北部安西王府城建成后，形成了“一大三小”的“四城联合体”，即以奉元城为核心，周边分布有咸宁县、长安县和安西王府三座小城，各自独立但又属于同一整体，其间相互呼应、共同防御的军事功能较宋金时期大为增强；从权力空间格局而言，在安西王前后承继的三十余年间，安西王府成了西安城的另一军政中心。

安西王府城虽然城垣仅约 4 里余，但其周边地区在当时却驻扎有大量军队，以环护王府，听其调遣。从功能上而言，这些军队驻地可谓是安西王府城的附属空间。在历史时期，西安地区大量村落往往依附于陵墓、军营、寺宇等而逐渐形成，与之相似，元代安西王府城附近的军队驻地在当时和后世也逐渐形成村落和街巷。

民国时期，西京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陈子怡撰有《西京斡耳垛考》一文，刊载在《西京筹备委员会丛刊之一·西京访古丛稿》中。他在对斡耳垛地区的村落进行详细踏勘、调查的基础上，对安西王府的地域范围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安西王府的规模和格局。

1932 年~1945 年“陪都”西京建设时期，在《西京快览》、《西京胜迹》、《西京指南》等各类旅行指南中虽然提到了大量西安城乡地区的历代名胜古迹，但唯独没有提及安西王府城，可见，到民国时期，除残留有殿基、墙址外，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安西王府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上接第 10 页) 有的社会分工设置专志的完整性。

要解决诸多不合理因素造成的矛盾，只能撤销基础设施篇，以社会分工为依托，按照现行的政府职能分工设篇立志。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管房地产、建筑和城乡建设，国家交通运输部管邮政，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电信运营，那么，现有的基础设施志完全可以分解，分别设立房地产和城乡建设志；水利

或独立，或入大农业志；交通志独立，下设运输、邮政章；电力、电信入工业志，顺理成章地设立电力工业、电信运营业记述，这样归类更加合理，记述更加完整。现有基础设施篇下的各章基本是完整独立的模块，撤并不难，即便已经编审结束的志稿，也只用调整篇目，内容整块切割重新组合即可。(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国地方志》2009.12)

第二轮志书体例模式倾向思考(中)

◎ 王 晖

三、上级机构应当从附录上升到独立专志

上级机构在每个地方都有设置,志书如何记述?首轮志书往往是将其作为附录,未免显得不尊重;有的干脆不记,更是一项缺憾。从实践和客观要求看,笔者以为上级机构应该独立设志。

(一)《北京志》设立《中央机构志》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北京志》作为首都志,编写难度不言而喻,正如北京市志办同仁所介绍的,按照正常的修志原则,寓居北京市的人物就记不胜记,因为全国所有顶级人物几乎都在北京有过活动。中央机构在北京,相对于人物要容易入志,因为机构是相对稳定的,不记中央机构显然无法真实反映北京的首都地位,因此,《北京志》设《中央机构志》是合理的,也为全国各地志书记述上级机构提供了借鉴。

(二)境内上级机构单独设志是志书全面系统性的客观要求。上级机构不是孤立的,仅仅是隶属关系不在地方,但在其他方面对地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合肥市被称作科技城,是因为中国科技大学和几十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设在此,加之科技成果的转换产品,必然对当地发展形成科技优势。第二

轮《安徽省志》篇目设计之初,笔者曾想设立《中国科技大学志》,征求该校意见时,他们也正准备编纂校史,同意史志两个项目一起上,可是后来就因为这所国家一流的大学不属安徽省管辖,是部属大学,不同意见便“义正词严”地将其移出《安徽省志》篇目。现在看来,借鉴《北京志》的经验,《安徽省志》完全可以设立《中国科技大学志》,这样才能反映合肥市是科技城的地方特点。

其他如国家税务、金融、气象、地震、烟草、邮政、海关等,这些垂直管理的中央驻地方的机构行政上虽不属于地方管理,但在党务工作上依然接受地方党组织管理。难以入志主要是指那些独立于双重管理之外的上级机构,例如有些部属大型企业、大型国营农场、国家重点科技教育机构,在省一级志书往往避而不书,少数是收进附录,作降格处理。这些情况在市县一级志书表现尤为突出。现在,每个地级市基本上都有一所隶属省管的高等院校,可是市级志书又基本上视而不见。一所大学在一个中小城市,不仅仅带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带来经济的繁荣、风俗的变化。不说市级大学,就连一个乡镇,如果有一所重点中学,都将给这个镇带来重大变化。可是许多志书就没有给这所上级机构

管理的单位应有的地位。借鉴《北京志》的经验,我们各地的志书,都应该给上级机构一席之地,使境内的事物能够系统完整地记入志书,使志书真正成为全面、系统记述地方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四、三大国策入志要全面协调,体现科学发展观

人口、资源、环境被视为三大基本国策,但志书没有很好地反映,而且形成不切合实际的模式,如以“土地”代替“资源”,违背科学发展观。

(一)第二轮志书普遍设置环境、土地、人口篇失之偏颇。我国将“人口、资源、环境”上升到三大基本国策的高度加以重视,并由此逐步形成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密切,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首轮修志就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并已付诸实践,第二轮志书应该更加完善地反映三大国策。现在的志稿以“土地”来代替“资源”,显得不够完整。当今,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都设立了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修志者也要适应这个变化。

(二)科学发展观要求设立完整的资源志。资源的定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即为资源。资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资源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如土地、淡水、矿产等自然资源;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主要是人力、科技、管理、信息等社会资源。二是资源的价值属性,任何资源均有可开发、利用的价值。三是资源的物质属性和非物质性,据此可

将资源分成两大类: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从物质属性上也可分为两大类: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源。所以,广义的资源概念指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狭义的资源概念就是指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可分成再生性资源、非再生性资源和恒定性资源三种。土地、森林等再生性资源可以重复使用,可以通过人工修整、营造等方式使之复得和再生;太阳、风能、潮汐能源基本是恒定的。

21世纪以来,我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提高资源利用率,走节约资源型发展道路。主要是建立节约和集约化资源的产业结构,包括节约和集约化使用水、土地、生物资源的农业产业结构,节约和综合利用水、能源、矿产资源等的工业结构,节约和集约化经营使用再生和非再生资源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外贸结构和社会结构,将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修志无疑要为本地可持续发展服务,因此,要重新调整志书篇目,编写包括土地、森林、水利、旅游、矿物、动物等自然资源的小资源志,也可以处理好与环境、能源、人事劳动、科技等志的交叉关系,编纂包括土地资源、气象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等自然资源 and 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智力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等社会资源在内的大资源志,展示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基本条件,完整地反映人

口、资源、环境三大国策内容,以贯彻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志书编纂工作。

大资源志难免与后面的其他专志有交叉,具体编纂时要注意各有侧重,资源志只是静态地记述资源拥有量,至于资源利用与管理等动态记述还应当归属相关专志中,如土地管理等内容,可移至综合经济管理篇中设置国土资源管理章记述。同理,资源志记资源,至于气象资源、水资源、生物(包含林业)资源等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都应当在相关的气象志、水利志、林业志等分志中记述。

五、基础设施篇设置不合理

第二轮志书个别省志篇目以及很多市县志都设立了基础设施篇,记述城乡建设、水利、交通、邮政、电力、电信。这个基础设施专志设置存在众多不合理因素。

(一)基础设施篇反映基础设施不全。已经出版和评议的志稿,除了记述城乡建设、水利、交通、邮政、电力、电信这几个行业外,还有其他如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医疗设施、体育设施等章节,就没有纳入基础设施内容。基础设施是各行各业都有的,如工厂是工业基础设施。志书若将所有行业的基础设施汇集一起,设立基础设施篇,内容将写不胜写,同时又将各行各业的专志内容肢解了,使他们失去了硬件基础。显然,基础设施就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宽泛的概念一样,不能作为志书分类的角度和门类,社会上也不存在基础设施管理部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也没有基础设施类别,因此,无论从科学分类,还是从社会分工出发,都不宜设置基础设施篇。

(二)基础设施篇淹没了城乡建设、交通等

大行业,使它们在志书中的位置降格了,譬如有的志将建筑、房地产升为篇,而城乡建设、交通却降为基础设施下面的一章,逻辑关系不顺。

(三)基础设施篇打破了志书经济部类一、二、三产业依次排列的逻辑关系。大部分基础设施篇是将二、三产业排到第一产业前面去了。简言之,一、二、三产业就是传统的农、工、商(含服务业),基础设施中的电力、交通、邮政、电信这些属于二、三产业,但因设立基础设施篇,居然都跑到农业第一产业之前去了,这不符合客观规律。

(四)基础设施篇标题不能涵盖现有的内容。方志界主张在自然环境篇里写城镇基础设施,本意是只写城市设施,属于人文地理内容,而不写管理,尤其交通中的运输既不是设施,也不是管理,而是经营服务。可是现在有的志书,设立基础设施篇后,既写某行业的基础设施,又写某行业的管理与利用,显然,以基础设施篇名来涵盖城乡建设、水利、交通、邮政、电力、电信等这些大行业,不仅做不到,而且本末倒置。

(五)基础设施篇破坏了行业系统的完整性。河北省的一个县志篇目,在基础设施志中设交通设施,在政治部类政府志中有交通管理,在经济部类里又有交通运输。将交通分散在自然、政治、经济三个部类中,严重破坏了志书的整体性,既不便于编纂,又不便于使用。修志者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要从社会分工现实出发,要从志书体例事以类从规范出发,不能随心所欲搞所谓的创新,把一个同类事物拆得七零八落,破坏了以现(下转第7页)



再论众手修志 代代相济 永不断章

◎ 杨忠诚 杨普社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极其艰辛而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纳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这是志界同仁通过修志实践总结出来的共识，已无可非议。

全面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内容颇多，诸如指导思想、资料工作、志书结构、表述方式、文笔风采以至装帧、校对等环节，均对志书质量的高低，起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决定作用，笔者不可一一而论。这里，就未央区地方志办公室如何开展修志工作以及操作过程中的实践体会，在工作策略上集中到“众手修志、专家指导”这一焦点上，再述浅见，与志界

同仁们商榷。

如何实践众手修志，代代相济，这里就需要有一个“施工”的流程问题。

一、培养骨干，标本兼治

在一切事物中，人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是已被实践所证明的真理，修志工作依然如此。

修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文化建设工程，且对大多数人来讲，均很生疏。众手修志是在开展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相对的、有对象的劳作，而不是广义的、泛泛的、谁都可以参与的简单劳动，更不能是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而是一项艰辛的、有条件的、有要求的脑力劳动。因此，就有一个物色人选、培养骨干的问题。只有很好地解决了骨干培养问题，才能使修志工作在“人”的问题上得到可靠的保障。从而，相应的加快修志进度，有效地提高志书质量，为修志事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修志骨干的培养，就其实际情况和方法而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由于修志工作周期过长，易受机构变更、人

员调整、人选不周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已经系统培养的骨干，在修志过程中产生可变性，因而直接影响修志工作进展。这就要求我们对修志骨干的培养，必须具有适合、适时而形式多样的多种应变能力，是不能单靠举办一两次骨干培训就能了事的。根据我区的实践，除了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的适时集中培训之外，通过日常业务灵活多样、有的放矢地加强指导，才是最有效的举措。

二、参与编纂，实践练兵

“实践出真知”这已被公认的唯物哲理，对编修方志而言，尤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我们在修志实践中，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

●学术交流●

充实理论。探索修志规律,提高修志水平,在指导修志工作的同时,我们有意地根据区志编辑人员的分工和各人所熟悉的专业,有目的地组织审稿,发现问题,全面指导,并有选择地协助基层单位,街道、学校、企事业单位,参与了部分专业志的编撰实践。通过岗位练兵,学到许多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发现和解决了不少带有共性的问题,熟悉了情况,掌握了修志规律。既加快修志进程,又提高了区志编辑人员的修志水平,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三、众手修志,集智成书

众手修志,就是广泛发动基层单位开展修志工作。即在广泛、深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由辖区各部门、各地区党组织领导、行政部门主持,按其业务范围编写自己的专业志或部门志。与此同时,区志办集中力量在业务上给予帮助指导,促其成书。一般而言,各专业、部门志书的形成,已经过了对资料的搜集、鉴别、筛选、考证等一整套理性拔高过程。从广度和深度上为区志进入编纂积累了扎实而丰厚的资料,为弥补区志编辑人员专业知识不足、研究和突出区情特色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极有利于区志的编纂。

说到众手修志,实际上是一个集思广益的问题,而一人成书则是成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操作流程和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这就是志界常说的“一支笔”统稿。反之,将大大的有损于一部志书的整体性、组织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文风的相对统一等。

四、调整篇目,组织分纂

篇目设计是形成一部完整志书的主体骨架。一般地,篇目大纲的制定,均始于整个修志工作全部流程的运转之前,并起着总揽全志、自成一体、指导修志工作正常运转的作用。当然,篇目设计是需要实践中不断调整、日趋完善的过程。毋庸讳言,在区志实践

工作中,往往由于事前对篇目应具有的逻辑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科学的理解,加之对地情特色、资料拥有、类目划分、统辖关系等心中无数甚至概念不清,因而,在进入撰稿时,感到漏洞百出,归类无从,或者出现交叉记述,此肥彼瘦等情况给分纂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和本可避免的反复现象。

通过我区修志实践,就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通过扎实的修志,各专业部门志均不同程度的为区志提供了详实而系统的资料。参照这些资料,区志对原有的篇目大纲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使区志篇目大纲的主体骨架更加完善,篇目结构更加合理,所需资料更加充实,记事所及更加贴切。

五、浓缩加工,精心组合

在有了各专业部门志所提供的资料之后,还需抓好以下几点:一是再次把关,慎重对待专业志稿中观点有误、提法欠妥、数据不实、推理记述等志书禁忌之处。二是要慎阅所供资料有无横缺门类,纵述断线之处,绝不能使志书成为缺胳膊少腿的“残志”。三是要对专业志稿作高度浓缩,细致加工,进行有机组合。否则,极易形成简单拼凑,从而降低志书质量。

六、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未央区修志工作的开展,为基层留下了60余部专业部门志书,产生了服务当代的良好社会效益。不少新任领导就职之后,首先索阅本部门或本地区的专业志,了解本部门的历史,从中汲取治本之策,改进工作。有的还将志书视为珍品,奉送上级,赠送友人,作为宣传、横联的必备之物。

通过众手修志,也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甘愿奉献,铁心修志事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为方志伟业撒下“连绵不断,代代相济”的种子。

屈光

屈光(1908~1979),又名培植,曾用名清辉。陕西蓝田人。9岁在本村读私塾,17岁从孟村高小毕业后考入三原渭北中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因家庭生活窘迫辍学返乡,不久经侯德普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同侯德普、陈子敬等人在孟村乡郗家河村创建蓝田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同

年9月,同赵伯平等人在孟村地区建立中共蓝田县特别区委,任区委委员兼共青团区委书记,负责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1月,屈光在长安、三原、彬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1月到省委工作,后又回蓝田进行中共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与杨荫川(杨珊)、杨字楷(杨森)、林之屏、白耀亭等人建立中共蓝田县特别支部。1930年10月29日,屈与杨珊、白耀亭等发动并领导了蓝桥暴动,被当局逮捕,后经营救出狱,继续在蓝田县开展斗争。1934年8月,屈在红二十六军蔡存堂、徐国连帮助下建立游击队,任队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西安事变后,屈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自卫军,屈光改任指导员,陈志正任队长。

1937年2月,抗日救国自卫军更名为抗日义勇军,屈等率自卫军随红十五军团南路军北上到礼泉、淳化。同年4月屈回蓝田建立中共蓝田区委,任书记。1938年任中共蓝田县委委员,1945年5月到马栏工作,1946年回蓝田参加谢华领导的游击队,率一小分队配合主力开展游击斗争,后主力北渡,屈带队潜入大峪山区坚持斗争。此后,屈光一直在蓝田、长安地区和湖北郧西黄云铺等地坚持斗争,开展群众运动,发展中共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屈光先后在安康、紫阳、蓝田等县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1979年3月病逝。

·名句欣赏·

【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列子·说符》

自贤:自己贤能。

【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淮南子·主术训》

态:虚假之态;不定:不知所措;求:贪求。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宋·苏轼《司马温公行状》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

兼、交:互相。

张德生（1909～1965），学名张世德，字心余、辛余，曾用名博五、仲房、老关、德甫等。陕西榆林（今榆林市榆阳区）人。1926年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读书，1927年加入共青团并转学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9年毕业到府谷任教，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被国民党逮捕，后经杜斌丞营救出狱。出狱后先



张德生

后担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宁夏区委书记，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1934年10月任中共川东北道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川西北道委宣传部部长，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德生到右路军，与贾拓夫等负责向导及与陕甘边和陕北中共组织的联络工作，经常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沿途的风土民情及地理特点，为长征红军确定行进路线，顺利到达吴起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后，张与贾拓夫等一起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兼任了一年时间的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6月张任省委书记。1943年1月，中

共陕西省委与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张任书记和警备第一旅、关中警备区政委，主要领导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于1945年10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后又兼任统战部部长。1947年3月张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7月底任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政治

部副主任、中共前委委员，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张仍任原职。同年6月中共一野前委成立常务委员会，张是常委之一。1949年7月张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8月26日兰州解放，张率省委机关进驻兰州。

1954年6月，张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10月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2月兼西北协作区会议召集人（后改兼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西北局，张任第二书记，仍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3月、1959年7月，张还被选为第一、二届省政协主席。

1965年3月，张德生在西安病逝。临终时遗言将遗体献给医学研究。



古代周至进士考录(二)

◎ 任 升

三、清代进士有 17 名

清代的进士有赵晒(顺治六年进士)、惠琨(顺治十二年进士)、王绍祖(顺治十六年进士)、惠士元(字仲晦,号瀛洲,乾隆七年进士 3 甲 14 名进士,散馆授检讨)、路慎皋(慎庄之弟)、路峙与其兄路桓(路德之孙)、陈庆门、路德、王禹堂、李宗涛、周维翰、路慎庄、袁

芝、郝适、王永、任肇新。

1、陈庆门,字容驹,号滑川,清雍正二年甲辰科进士三甲四十八名。历官绥定府知府,四川达州知州。所至亲民薄赋,平徭役,修文庙,建书院,士民称颂。清雍正年间任庐江县知县。他在雍正三年奉命前去舒城调查水灾时“目惊心伤,感而有作”,写了一首诗《舒城水灾行(并序)》。著有《仕学

一贯录》。

2、路德、路慎庄

路德与其子孙路慎庄、路慎皋、路桓、路峙五人先后皆中进士。

(1)路德(1784~1851),字润生,号鹭洲。清嘉庆十四年中二甲进士七十七名,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嘉庆十四年户部湖广司主事,三年后考补军机章京职。以眼疾告归,专心治学。辞官后,在关中、宏道等书院主讲。工理学,从学者众多。著有《怪华馆诗文集》、《仁在堂时艺》等。他的著作《怪华馆全集》在日、俄、朝鲜等国传播很广。西安市文物局和周至县文管所均有收藏。

(2)路慎庄,路德长子,字子端,号筱洲。道光十六年二甲进士二十六名,授翰林院编修,任福建乡试副考官,后迁御史、淮海道。他博集群书,富藏典籍,为当时著名藏书家。所著有《蒲编堂书目》、《唾余稿》等。

3、王禹堂，字幼沛，号笠翁。二曲镇北潭堡人，清道光九年己未科进士三甲三十四名，补刑部主事，记名御史等。后归里授徒著述。禹堂文笔俊逸，在当时很有名望。同治二年被李蓝义军杀。他诗文豪放，与京师闻名的湖南进士汤鹏，有“南汤北王”之称。其著作现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有《风土草》、《说古答客草》、《说书答友草》等。

4、李宗涛，原名李宗炎，字午山，今广济西堡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编修，后出任湖北武昌太守，因才干突出，被任命河南署任开封，次年改任黄河观察使，河南提刑按察使，河南布政使。他爱民如子，同治元年（1862）五月，回家守孝，多隆阿（清朝大将）请李宗涛帮办军务，筹备军饷，次年李蓝义军攻陷周至，多隆阿要炮轰县城，李宗涛连忙阻挡，使城中百姓的生命财产

免受炮火之灾。

5、任肇新（1868·10~1927·9），周至辛家寨乡大寨子人，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三甲八十五名。授内阁中书，任甘肃循化厅知行。为官清廉，初上任，他写楹联于衙门：“受半文百姓钱，明有国法，暗有天谴；做一点亏心事，近极本身，远报子孙。”辛亥革命后归里，仅带书箱，几无钱财。他设馆授徒，钻研医学，不分贫富，义务为群众治病。曾任陕西省第二届参议员。在他主持下，编纂有《重修周至县志》（1925年刊行）。

周至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发掘先人的先进事迹，对激发我们爱家爱国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一件史料的完善，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需要查阅

搜集大量的资料，有的资料更是扑朔迷离。在写这篇文章时，为查找明代刘英的资料，我走访了45个村子，没有得到关于刘英的信息。而在《即墨县志》介绍明代进士蓝田的高尚品德中，发现提到了一个刘英。蓝田的父亲蓝章任陕西巡抚后，蓝田担任了陕西巡按。后来，蓝田回山东即墨老家时，其好友刘英从莱州调任宁州时路过即墨，将一部分行李留在了蓝田家，不幸的是刘英全家在海中遇难，蓝田不远千里托人叫其胞弟拿走了行李。这个刘英是哪里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周至的刘英生在哪个村子？他的后人还在不在周至？这一切谜团需要我们在全县的村子、全国的县志中查找才能得到解开。

（全文完）





西北大旅社旧貌

“逆旅”、“旅舍”、“假居”等。并出现车马店“车坊”以及专供邮使和进京官员食宿换马的“驿”，都城驿、城东驿、长乐驿、灞桥驿、滋水驿、蓝田驿、蓝桥驿、细柳驿、户县驿、周至驿、骆口驿等，都是著名的馆驿。

五代至清末，西安旅店业没有什么发展。民国时期，西安的旅店逐渐增多。民国 20 年（1931 年）开业的西北大旅社是

早在西周时期，京城丰镐就有官办的旅店，分为候馆、路室、逆馆，具有不同的等级和规模，食宿兼备，

专人管理。春秋战国时期，旅店

称“舍”或“客舍”，已很普遍，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秦孝公时（公元前 359~前 338 年）商鞅主政，加强对旅店业的管理，开店要有执照，住店要有证明。秦国的旅店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即传舍（又称上舍）、幸舍、代舍，另有专设的国宾馆，叫邸。汉朝的旅店已具有相当规模，通往国都长安的交通干线设有旅店，不但供应食宿还提供交通工具。长安城的旅店多称“亭”，亭设亭长。长安周围共有 120 多个亭，见于典籍者有戏亭、枳道亭、长安亭、白亭、平望亭、桐柏亭、长门亭、广明亭、杜陵亭、曲亭、郎官亭、霸陵亭、昆吾亭等。唐时长安有官府修建的旅店 300 多家，接待国宾食宿的称“候馆”，接待外商食宿的叫“邸”，接待州郡官员食宿的叫“邸舍”，接待一般平民食宿的叫“客舍”，又叫“客店”、“客院”、“客坊”、

当时西安最大的旅店。民国 25 年（1936 年），西安有旅店 109 家。民国 28 年（1939 年），西

安的旅店商业同业公

会建立。民国 30 年（1941 年），西安有旅店 151 家。西安解放前夕，旅店减少到 90 家，东大街有花园饭店、西北大旅社、关中旅社、西京饭店、茂盛客栈、南京旅社；尚仁路（今解放路）有欧亚饭店、永盛旅社、鲁西旅社、远东饭店、陇海旅社、北京饭店、北平大旅社、大金台、济南旅社、西京招待所、东方旅社、中州旅社、中国饭店；北大街有万盛店、中央商栈、德兴客栈、玉盛店、福盛店、四兴店、新中旅社、迎来自客店、华北旅社；西大街有复兴厚客栈；西关正街有高升店、德福店、德新店、魁盛店、金义店、富德店等，共有床位 5000 多张，设施简陋，接待能力差，服务水平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对旅店行业进行整顿改造，革除陈规陋习，建立新 1931 年开业的西北大旅社旧貌的制度，坚决取缔

西安旅店行业发展漫谈

●史料钩沉●

旅店中留客聚赌、留娼宿奸等恶习,废除亲友熟人的住宿不收费的陈规,停止收取小费等做法。1952年全市有私营旅店180家,从业人员715人,资金106万元。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公私合营旅店有288家,从业人员1045人,资金90.3万元。是年撤销西安旅店商业同业公会,分别成立西安市旅济和福利两个公司,对全市旅店、浴池、棚彩、寿枋行业和照相、理发、洗染、寄卖行业实行统一管理。“一五”时期,国家投资在火车站新建解放饭店,在西郊、韩森寨、小寨分别新建土门旅馆、韩森寨旅馆和小寨旅馆,全市旅店床位增加到1.23万张。1958年,西安撤销专业公司,将旅店网点移交各区商业局管理,旅店吸收一批女职工承担旅店服务工作。1960~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安的旅店减少,其后贯彻调整方针,恢复和新办一批合作旅店及连家店、夫妻店等。“文化大革命”时期,西安旅店住宿紧张,各旅店实行通铺、过道加床、浴池开设夜间旅店等方法,仍无法满足外来人员住宿需要,每天都有3000多人徘徊在车站、街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安旅店业蓬勃发展。1979年,全市各种经济成分的旅店发展到104家,有职工2470人,床位16073张,其中社会办旅店29家,床位4544张。1984年,中外合资钟鼓楼饭店和金花饭店相继建成,为西安旅店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模式、新的经营理念和新的管理方法。1985

年,西安的旅店业实行全面改革,实行经理负责制试点,并按不同情况实行改、转、租。在经营上,从单一经营开始转为以一业为主、综合经营的多功能结构,发展横向联系,扩大副营业务(将临街房屋办商场等),房间收费标准按档次拉开。1986年,西安市服务公司会同公安部门对全市1450家国营、个体旅店进行整顿检查,制定《旅客住宿须知》,统一计时收费办法。1987年,西安的旅店业以改革为中心,完善经营机制,全面实行经理负责制,员工工资实行提成工资制。1988年,西安旅店业在经营上主要抓客源,扩大副营业务,跨地区、跨国建立业务联系网。西安解放饭店和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新加坡、香港等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业务联系,胜利饭店以接待海外零散客人为主,其服务周到、价格低廉颇具吸引力。两饭店全年接待海外游客77294人次,创汇203.5万元。1990年,西安共有旅店1392家,职工2.06万人。

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旅店行业飞速发展,截至2008年底,西安市纳入统计范围的酒店共计92家,营业收入208869万元,经营利润64399万元。





陕西商帮所创造的 “历史第一”

◎ 李刚 广红娟

陕西商帮是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十大商帮”中产生最早、资格最老的“天下第一商帮”。在五百多年的历史岁月里，他们发挥陕西人的历史创造力，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许多第一，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演绎了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

一、陕西商帮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

商帮，是以省(县)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人集团。这种商人集团化经营模式是明代初年明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政策的产物。而以“输粟换引”为主要内容的“开中制”是朱明政府对陕、晋两地制定的特殊政策。陕西是边关地

区，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着祖国西北的广大地区并成为明代边防重点地区，将陕西粮食输送边关换取盐引，路近省费，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陕西是产粮区。陕西八百里秦川，自古是中国的精耕农业区，明代陕西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中上水平，西安府在明代全国产粮最多的164个府中排在第四位，是西部粮食输出的主要省份；西安曾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秦汉以来陕西商业的超前发展就使陕西商人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这些历史和文化元素，使

得陕西商人风云际会能够抓住“开中制”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乘势而起，成为明代初年产生最早的输粟换引的商人集团，号称“运粮大军”，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

二、陕西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明代初年西北地区最大的边患是西番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和蒙古族的侵扰。而边疆少数民族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大量需要内陆所产的茶叶来化解食牛羊肉喝奶酪的油腻。茶叶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程度。而在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权主要是从少数民族手中获取战马，“天下腾蛟者不逾陕西”。在这种情况下明

●史料钩沉●

政府因地制宜地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因为在北中国只有陕西包括安康、汉中在内的“紫阳茶区”才产茶。因此,用紫阳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马匹的“茶马交易”政策,就成为明政府唯一在陕西实行的安边强国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引导下,陕西商人大量贩运紫阳茶区的茶叶到边关,从而开创了从紫阳经汉阴、石泉、洋县、西乡到汉中,又由汉中分两路,一路经凤翔趋秦州(今天水)到兰州;一路经凤县、两当、徽县到河州(今临夏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为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陕西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

在柴达木盆地没有被开发之前,陕西定边盐池是祖国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主要供应甘肃、宁夏、陕北乃至汉中、安康的食盐需求。明代弘治年间,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并从草原换取战马,明政府在陕西边地又实行“盐马交易”政策,允许陕西商民贩运定边盐湖的食盐到伊蒙草原换取战马,并在陕伊边地设“七大马市”大规模地开



展盐马交易。在这一特定边地贸易框架下,定边盐池才改名为“花马池”,即用定边的白色食盐换取草原上的五花马。陕西定边商民纷纷驮盐上路,贩盐到伊蒙草原各地,开创了从定边边墙沿长城东趋达于榆林的“红山堡”马市和经三、四马路走草原到伊克昭盟旗草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从而使那一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赶牲灵》在毛乌素沙漠上由陕西盐商咏唱了五百多年。

四、陕西商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合伙股份制”企业制度

陕西商帮是利用“开中制”政策机遇走上集团化经营的商帮。当大批陕西关中农民输粮换引、进城经商时,他们个体家族的力量是微薄的,而他们所承担的经营任务又是十分巨大的。如明代初年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一家就供应着定边最大的军营柳树涧堡 1084 名军士、374 匹战马的粮草所需,动辄千百石粮。一家的力量不够,只好动员亲戚乡党,联合同县盘石村石家、韩村李家、亭口村王家、薛村路家“益治边事”共同走上输粮边地的道路,后来形成富平北乡四大富户,这就是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合伙制的缘起。

后来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共同努力将这种“合伙股份制”发展到进一步完善的程度。它包括:以万金帐为主要内容的融资制度;以委托经营为主要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经理人的“记名开股”制度;以“驻中间,拴两头”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经营制度;以在岗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学徒制度;以店规号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以“镖期”为主要

形式的企业资金流通制度等。这种类似今日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制度是陕、晋商人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可资借鉴条件下独立的历史创造，它比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制度早了将近三百余年。

五、陕西商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

清代初年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在四川经营贸易和金融积蓄资金，到雍乾年间利用清政府在四川实行“计口授盐”的政策机遇，开始投资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使“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由于川盐是凿井煮盐，投资量大而且成败不定，遂使陕西商人创造了转顶、接逗、坐下节的资本接力投资形式。由于一井常为多人投资而成，从而使陕西商人在自贡创造了以“年限井”为主要内容的契约股份制企业制度。

这种契约股份制的内容包括：以“出山约”为主要形式的联合投资制度；以每天24小时划分的“日分”股票制度（即每分代表每天可推盐卤80担）是含有实际盐水产量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转让和馈赠；股份买卖以契约交割的形式进行；投资风险的有限责任制度；以“陕西大关”为主要形式的委托经营制度；以“厂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管理制度。这种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已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形，它比西方的股份制早了一百年，是陕西商人对世界经济史做出的重要贡献。

六、陕西商帮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歇家”、“锅桩”民族贸易中介形式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承担着沟通西部少数



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他们是面向西部少数民族的主要商业力量，当时被称为与南方商人对应的“西商”。当陕西商人携货到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贸易时，风俗不谐，言语不通，他们只好自办货栈，以寄货造饭。这种自办货栈的形式，在青海叫“歇家”，即汉语“歇伙”的意思，当年青海西宁、湟源等地的38处“歇家”均为陕商所办；在康藏叫“锅桩”，即汉语“垒石造饭”之意，当年康定的47家“锅桩”都为陕商所办。后来当地土人见办“歇家”和“锅桩”有利可图，开始与陕商联合举办汉藏合璧的“歇家”和“锅桩”，作为居停货物，传达语言，沟通买卖，说和价值的汉藏贸易中介组织即贸易经纪人，这就是青海“歇家”和康藏“锅桩”的由来。当陕西商人围绕着“锅桩”手舞足蹈时，就创造了被称为“中国迪斯科”的“锅庄舞”；当陕西商人看到“太阳端端照在康定城上”时，脱口而歌，就创造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康定情歌》。

七、陕西商帮创造了天下第一名酒“茅台酒”

在清代，当陕西商人按照清政府规定的“川盐入黔”经营体制，携带自贡井盐入云、贵

●史料钩沉●

贸易时,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就成为转运川盐的水旱码头,史称“盐走赤水河,秦商聚茅台”。由于茅台镇大量陕西盐商云集,有一段时间茅台镇曾改名为“盐商镇”和“盐镇”。由于陕西商人来自酒的故乡,而当时贵州没有好酒,唯一的酒叫“洋柯曲”,酒品低劣。在茅台镇办“协兴”盐号的陕商高绍棠,为酒所困,回到故乡找来凤翔柳林镇酿酒名师田某,携带西凤酒的配方来到



茅台镇,利用赤水河的水和当地的优质高粱,经九次勾兑,创造了品质优异的“茅台酒”,当时叫“茅台烧锅”。1915年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茅台酒一举夺得金质奖,成为中国国酒的代表,号称“天下第一名酒”,这就是陕西商人对世界物质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四川的“全兴酒”和“郎酒”也都是陕西商人创造的。

八、陕西商帮创建了“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赴外地做生意,服牛格马,周流天下。为了联乡谊,敬神麻,议商事,保太平,促进在客地的贸易事业,他们在各地建造了作为自己贸易根据地和异乡故园会馆。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会馆数陕西”,陕西商人联合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在全国建造会馆最早和最多的商帮。目前有据可查陕西商人建造最早的会馆是明崇祯年间河南上蔡县“山陕会馆”,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被称为“天下第一会馆”的河南社旗县“山陕会馆”。

河南社旗县在明代叫“赊旗镇”,为沟通

大运河的南北贸易码头,明代以来大量陕西商人在社旗经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陕西韩城王庄党家,即今日的党家村。党家在社旗主要做栗行、布匹和木材生意,社旗九条街区之一的太平街,整条街都是党家的生意。党家还专门在社旗修筑了自己的专用码头——唐河码头。清代乾隆四十七年由党家发起联合当地的山陕商人集资 87786 两白银,耗时 110 年,建造了由山门、铁旗杆、钟鼓楼、舞台、东西廊房、拜殿、陪殿、春秋楼一系列豪华建筑构成的山陕会馆,成为社旗著名的文化景点和文化活动场所,被河南认定为“天下第一会馆”,而当年社旗山陕会馆的馆首就是陕西党家后人党燕堂。像这样的会馆,山陕商人在各地共建造了有据可鉴的 274 所,有力证明了陕西商人的经营业绩和历史创造。

凡此说明,陕西人(包括陕西商人)是富于历史创造性的人群,传承陕西商人的历史创新能力,科学发展,陕西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美好。

(摘自《经济观察》)

1932年“虎烈拉”大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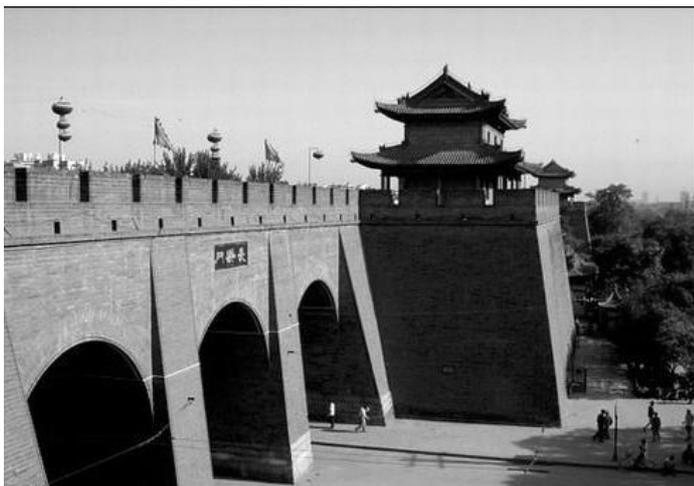
◎ 封五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秋,陕西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地区霍乱大流行。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其外文名称 cholera,音译为“虎烈拉”。该年6月19日,潼关居民首先受染。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国民党地方当局又没有及时采取控制措施,致使疫病由潼关向西北迅速蔓延,日甚一日,造成人民群众大量死亡。霍乱传染,势急凶猛,据统计流行地区,关中有35县,陕北有11县,陕南有4县,共计50县。其中以关中地区的华县、华阴、渭南、朝邑(今属大荔)、合阳、蒲城、户县等地最为严重。据统计,全省因霍乱病死亡达十三四万人。

西安交通较为方便,因此霍乱很快传入西安。当时,城内以今碑林区、莲湖区人口较多。据一些老人回忆,霍乱病症有两个特点:一是剧烈吐泻,严重者出现血便、吐黄水;二是小腿肚转筋,口渴、耳鸣、呼吸增快,神志不清,表情呆滞,眼窝塌陷,出现虚脱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病人很快就昏迷死亡。故群众称之为“虎烈拉”,也称“虎疫”。由于群众缺乏卫生防疫知识,对霍乱危害认识不足,因此在初期发现患者还送往医院治疗,对死者仍按习俗办理丧事,停灵祭奠,更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后来,城市的人们一发现患者,便抬送医院放在院子或走廊上,即一走了之,不顾而去;在农村,各村分别断绝交通,严禁外人进出,并大敲锣鼓以“驱逐病魔”。这怎能济事?往往是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家患病,全

巷(村)遭殃。最严重的一天,西安死亡人数达800多人。因死亡率高,开始时棺材铺被一抢而空,后来即用席卷死尸,找人掩埋都有困难,有的倒毙街头被狗吃掉,有的尸体被扔进枯井或土壕中,无人过问,时间一长,尸体腐烂,臭气熏天,无敢掩埋者。据说当年“家家有灵堂,夜夜闻哭声”,西安霍乱流行惨状,真的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至今记得的人提起它仍谈“虎”色变。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杨虎城以省主席兼任民政厅长,亲自挂帅,动员全省公私医务工作者投入隔离抢救,联系欧亚航空公司加班运输药品。当局组织了临时医治霍乱的机构,由卫生界知名人士杨叔吉、李润泉等数人组成委员会。他们积极主动采取许多应急措施,深入重疫区进行防治工作。那时,西安市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曾两次进行消毒,并在各城门口设检疫所,检查出入行人,同时禁止带菌的瓜果进城。那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杨虎城的夫人杨葆真等捐献过大量疫苗、救急水等药品。有些慈善团体也主动去疫区,散发防疫药品,或组织成员中的医务人员进行救护工作。所有这些均起到了一定效果,很快控制了病势的扩散。关中地区到9月底即基本停止蔓延。为了防止复发,杨虎城又从军费中拨出专款购买了一套制造霍乱疫苗的设备。第二年春,又设立专门机构,用自制的疫苗普遍进行预防注射,使这一严重的传染病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



编者按：西安城与其前身隋唐长安城，在建筑布局上，具有象天易纬的神秘色彩；诸座城门历经千百年来朝代的嬗变和一幕幕历史事件，演绎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了解西安城及其前身隋唐长安城的典故趣闻，更能深刻认识西安古城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西安城墙典故趣闻(一)

一、隋文帝惊梦建新都

公元 581 年二月，北周的大贵族身居大丞相的外戚杨坚，废黜了年仅 10 岁的外孙周静帝宇文阐，自立为帝，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

隋朝立国之初，仍沿北周之后，以汉长安城为都。但隋文帝在此却夜夜不得安眠，常常从噩梦中惊醒。让他日夜揪心不安的，是汉城北边渭水对都城的威胁。唐人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说：“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

原来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汉长安城，南枕龙首原，西北临近关中水量最大的渭河。由于渭河水道的弯曲流向，致使汉长安城的西北城墙，随着河流走向曲折凸凹而不能伸直，犹如天上的北斗星形，从而被称之为“斗城”。元代学者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指出，汉城西北面城墙之所以曲折凸凹而不能伸直，并非有意模仿北斗星形，而是受临近渭水流向的影响。他说汉长安城“其西二门以北，渭水向西南而来，其流北据高原，千古无改，若取东城正方，不惟太宽，又当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者，言其委曲迂回之状盖是顺河之

势，不尽类斗之形”。不仅如此，由于渭河不断向南摆动，逼近汉城，汉城时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致使汉城内外的百姓，时时为之提心吊胆，人人莫不自危。汉成帝建始三年(前 30 年)秋，关中大雨成灾，渭水漫溢泛滥，时有渭水岸边虬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汉城北面西头第一门)”(《汉书·成帝纪》)。还有一次，有人在汉城北城墙上夜呼洪水来了，结果引起全城人的惊恐。故此，隋文帝为了解决“洪水没都城”的威胁，从立国的第二年即开皇二年(582 年)六月起，就重新另建新都大兴城，并且把新都大兴城选建在龙首原之南，即今西安城处，从而以高大的山原把渭水与新都从中远远隔开，从此隋文帝可以高枕无忧，不再做渭水没都的噩梦。

二、象天设都大兴城

古人认为“建邦设都，必稽玄象”(《旧唐书·天文志》)，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建筑布局，就体现着神秘的天象观念。首先，隋唐长安城改变了我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宫城必在郭城之西或在郭城西南的传统位置，而将皇帝居住的宫城转移置于郭城北部的正中，以象征着天帝所在的北辰天宫，

是为天中。这种布局在建筑手法上就突出了宫城的中心地位，也就是突出了封建皇帝居于最高统治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封建皇帝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传统思想，而且在地形上还可以背靠龙首原的有利地势，以西内苑禁苑控制都城北部地区的制高地段，从而有利于宫城的防卫和最高统治者的安全。其次，隋唐长安城首创百官衙署的皇城，并将其安置在紧依宫城之南，象征着天象中以北极为中枢，众星官环绕成屏藩形状的紫微垣。又次，以外郭城中的众坊里，以宫城为中心安置在东、西、南三面，象征着天上的群星向北辰环拱的天象观念。所谓“开国维东井，城池起北辰”（唐人张子容《长安早春》诗）。从而使隋唐长安城的建筑规划，具有以天象布局的神秘色彩，并体现着皇权中心的设计理念。

三、“九三”之地立皇城

今西安城的東西大街一线，是一条约为隆起的高地，这被隋初大兴城的规划设计者比附为“九三”之地，是设立皇城百司，“以应君子之数”的地方。

原来隋唐长安城北靠龙首原，城内有六条余坡隐起于平地，自东北而西南，分布在今西安红庙坡与大雁塔之间，从而在都城地区形成为六条高坡，称为“六坡”。“隋文帝包据

六坡以为都城”（《雍录·龙首山龙首原》）。隋初就是在此六坡的基础上，利用地形的自然趋势来规划设计隋大兴城的。当时，隋都规划大师宇文恺以此六坡，依据《周易》象数理论，比附乾卦六爻，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

第一条高坡在今西安城西北的红庙坡向东至自强东路北二马路一带，比附为乾卦六爻的“初九”。《周易》云：“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初九之地，龙尚潜伏在水中。同时也由于这里地处龙首原南坡，不适宜营建宫室，故宇文恺将此“初九”之地，规划为西内苑、大兴苑（唐称禁苑）皇家风景园林区，从而也据守了潜龙所在的“龙脉”之地。

第二条高坡在今西安城的北城墙一线，大致沿400米等高线作东西走向，比附乾卦六爻的“九二”。《周易》云：“九二，见龙在田。”意思是九二之地，为龙出现的地方，故宇文恺将此九二之地规划为皇帝居住的宫城之地。

第三条高坡在今西安城东西大街一线，比附乾卦六爻“九三”。《周易》云：“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九三之地是君子所在之处，君子在此整天自强不息，晚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样即使遇到危险也会逢凶化吉。宇文恺以“君子”比附王公大臣，将此“九三”之地规划为百官衙署所在的皇城地区。当然，皇城的这种位置安排，既可以使它居于都城的中心地区，从而有利于中央机构的安全与防卫，并可对宫城起着拱卫作用。同时，皇城紧依宫城之南，又便于百官入朝，利于最高统治集团接近和及时处理政务。

故此可以看出，六坡地形结合《周易》象数运用，在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其中“九三”之地立皇城，是其规划建设中的巧妙安排，并具有象数理论的神秘色彩。





丈八沟的传说

位于雁塔区境丈八北路南端的丈八沟之名,一说系唐代宗李豫大历元年(766年),京兆尹奏开漕渠入苑,深八尺,宽一丈而得。另有民间神话传说,即唐太宗年间,泾河巡河夜叉到长安街上游逛,听见渔翁张乐尚对樵夫李定说:长安城南有个算卦先生能知天上人间未来之事,百算百准,不差分毫,连泾河里哪里有鱼,哪里鱼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泾河两岸的渔民弟兄天天网不空收,全都是托他的福啊!夜叉回去把听到的话禀报给泾河龙王,龙王骇然:果真有这样灵验的算卦先生,我们泾河的虾兵鱼将就要断种灭门了,于是

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

一天,泾河龙王装扮成一个白面书生,去找算卦先生。凑巧当时不少人正围着算卦先生问几时有雨,现在能不能下种。龙王站在一旁静观,看算卦先生怎样答复。算卦先生伸开右手,掐指一算说:“三日之内必有清风细雨,赶快回去选好种子,免得误了春耕”。

龙王听了心里十分疑惑,心想:下雨之事由我执管,啥时下雨我还没有接到雨布,他怎敢信口胡说?龙王上前追问算卦先生:“你敢断定三日之内会有清风细雨吗?既知有雨,雨量能有多少?”算卦先生把这位书生上下打量一番,已知他是泾河龙王,但不点破,而不紧不慢地对他说:“雨必下无疑,雨量一尺二寸零二点八。”泾河龙王更加不信说:“如果按你说的分毫不差,你就不用算卦了,我给你一千两金子,让你一辈子也吃不完。如果有差怎么办?”算卦

先生坦然回答:“如果有变,你把我的摊子砸了,从此我再不算卦了。”二人一言为定。泾河龙王一回到水晶宫就接到玉皇大帝降下的圣旨,要他在三天之内降清风细雨。泾河龙王大吃一惊,此时才知道算卦先生不是等闲之辈,但又不甘心输给这个江湖术士,于是斗胆违抗玉帝圣旨,第二天降了一阵狂风暴雨,下得河水横溢,房倒屋塌,庄稼淹没,民不聊生。

第三天早上,泾河龙王又变成那个白面书生去见算卦先生,神气活现地说:“先生果然料事如神,想不到这次会失算吧!”算卦先生轻蔑地一笑说:“失算的大概是你,你胆敢

偷改雨布,快回去准备后事吧!”

泾河龙王听了算卦先生的话,先觉得可笑,但是细一琢磨又觉得有点不对,心想:他怎敢随便说我会杀身之祸呢?想想有点后悔,于是扑通一声跪在算卦先生脚下,苦苦哀求说:“算卦先生,你是活神仙,怪小龙争胜好强,私改雨布,惹下这场杀身大祸,求先生再算算,有什么办法救我脱灾!”算卦先生念他可怜,对他说:“你自作自受,我也没法救你,不过我已知道此次监斩官是唐王宰相魏徵,你去求求唐王,或许能救你一条性命。”

泾河龙王回去后,果然玉帝派天神传来圣旨,让他接旨后第三天去天宫受刑,泾河龙王惊惶万状,急忙备了一份厚礼去见唐王。

唐王李世民正在宫中睡得迷迷糊糊,梦见泾河龙王前来求他,说明事情原委,放下礼物就急忙走了。李世民一觉醒来,看见榻前放了许多珍珠玛瑙、奇珍异品,回想刚才梦里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便想做个顺水人情。到行刑这天,把魏徵召进宫中和他谈古论今拖延时间,急得魏徵如坐针毡,惟怕误了监斩时间。可是唐王还是不让他走,并命宫人把棋盘摆好说:“你和朕对弈三盘,不管输赢,朕让你走”。魏徵眼看午时三刻马上就到,哪有心情下棋,可是又不好拒绝,只好硬着头皮相陪,一盘棋没下完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李世民一看,正是午时三刻,暗暗高兴,心想这下泾河龙王得救了。过了一阵魏徵醒过来,只见浑身冒汗,显得十分疲劳,唐王问魏徵为何如此汗流浹背,魏徵赶忙跪下回奏说:“臣罪该万死!适才臣驰天官,奉玉帝旨监斩泾河龙王,怕怠慢万岁,仓促赶回,故而浑身冒汗。”

斩后的泾河龙王头从天上掉下来,落在古长安城西南,把地面砸成一个一丈八尺的深沟,后来这个地方的村名就叫丈八沟,俗称丈八头。

(雁塔区地方志办公室)



漫谈秦腔

秦腔,发源于陕西、甘肃一代,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因用“梆子”击节,故也称“陕西梆子”,又因陕西地处古函谷关以西,古称“西秦”而有“西秦腔”之称。当地也叫“梆子”、“桄桄”、“乱弹戏”、“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大戏”等。

关于秦腔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秦、形成于唐、形成于明的说法。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抄本《钵中莲》传奇第十四出曾用“西秦腔二犯”唱调,是关于秦腔最早的记载。该剧是江南无名氏之作,证明已经传到江南,江南远离陕西,传播需要时间,这证明秦腔明中叶当已形成。另据调查,明代最早的秦腔班社是周至人所创办的华庆班,曾驰名陕、甘一带。

秦腔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这个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就有36个秦腔班社,如保符班、江东班、双寨班、锦绣班等。秦腔的唱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

●西安风情●

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秦腔因其流行地区的不同,衍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的称东路秦腔;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称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叫汉调秦腔;流行于西安一带的称西安乱弹(就是中路秦腔)。各路秦腔因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有差别。近五十年来,东、西、南三路秦腔都不发达,中路秦腔起而代之,在整个西北地区均占绝对优势。

秦腔的角色分为四生、六旦、二净、一丑,共计十三门,又称“十三头网子”。演唱时须生、青衣、老生、老旦、花脸多角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有人赞美秦腔是“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使人血气为之动荡”,正是出于秦腔表演的特色。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程式严谨,技巧丰富。身段和特技有趟马、拉架子、吐火、吹火、喷火、担子功、梢子功、翎子功、水袖功、扇子功、鞭扫灯花、顶灯、咬牙、耍火棍、跌扑、髯口、跷工、獠牙、帽翅功等。

秦腔的优秀演员,除清代的名冠南北的大艺术家魏长生外,还有被誉为花部四美的



王湘云、陈婳碧(良官)和渭南派的申祥麟,同州派的栾小惠,周至派的桃琐儿,长安派的岳色子等。光绪中后期有润润子、玉喜儿、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李云亭(麻子红)、刘立杰(木匠红)、王文鹏等。辛亥革命以来,有名丑马平民,名小生苏哲民、苏育民,名旦刘箴俗(有与欧阳予倩“并驾齐驱”之誉)、王天民(人称“西北梅兰芳”)、李正敏(人称“秦腔正宗”)、何振中、宋尚花等。名净田德年和名须生何家颜、耿善民、张锁中、刘毓中、刘易平等。特别是秦腔表演艺术家陈雨农、王文鹏、党甘亭、李正敏、王天民、刘毓中、郭明霞以及原“三意社”的编修李逸笙、苏哲民等人,在唱腔、表演、化妆造型等方面都有创新。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1899~1946年),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据说闻一多新婚那天,亲朋好友一大早就拥入家门,前来贺喜。可好久不见新郎出来,大家都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门时,人们才在书房里找到他。他仍穿着那件旧长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兴味正浓。家人嗔怪他,夺下他的书本,说这个大喜时刻不能让他看书,他一看上书就“醉”。

石渠阁与司马



石渠阁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周河湾村村东。它经历了 2000 多年的风雨沧桑,现只剩下东西长 72.5 米,南北宽 73 米,高约 40 米的土夯台了,它和天禄阁并列为我国最早的档案馆和图书馆。

石渠阁建于西汉初,传为宰相萧何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195 年),监修未央宫的同时修建起来的。因未央宫西南的浴池水流经其下,而为砉石为渠,故取名石渠阁。

西汉时,石渠阁规模宏大,阁楼华丽,景色宜人。在刘邦入关占领咸阳后,萧何首先入秦室,把律令、图书全部收藏起来,妥善保管,以待建立新王朝借鉴利用。萧何所收藏的律令、图书,数量浩繁,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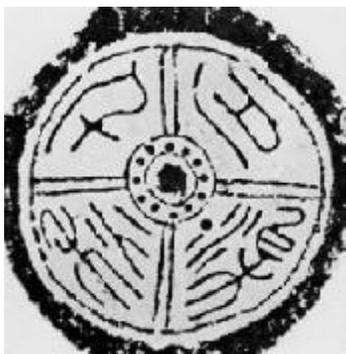
容丰富,包括秦记,百家语,医药,占卜和农业等方面的典籍图书。另一部分是秦始皇时代产生的档案文书,有律令、礼仪、章程等,包括秦王朝的规章制度和其他各种资料。石渠阁不仅是西汉王朝保藏秦代律令、图籍和其本身活动所形成的主要档案材料的中央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馆,而且是讲学、议论朝政及国家大事的场所,著名学者刘向曾在此讲议五经,校正书典和整理图书多年。甘露三年(前 51 年),汉宣帝召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肖望之等平奏其异于石渠阁,历史上有名的“石渠阁奏汉”,为传播我国古代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成帝时,又将搜求天下的遗书也藏于此阁。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写下的中外历史名著《史记》,就是参考这里的档案图籍写成的。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继父任职太史令,在石渠阁阅读丰富的藏书和许多历史资料,能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这些资料,是丰富《史记》内容的重要源泉。



蒋村正月民俗活动

(富小云 整理)

户县蒋村正月民俗活动,自清代康熙初年形成基本程序和形式以来,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蒋村正月民俗活动,自正月初一始,至二月初二结束,历时一月。整个活动以双方对垒的方式进行。

对垒方式。蒋村按历史习惯分为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个居住群落,村民也按居住方位分为相应的四个群体。正月民俗活动是在四门之间以对垒的方式展开的。按照世代沿袭的规矩,东门和西门对垒,南门和北门对垒。但四门不能同时对垒。两方对垒时另外两方作为对垒双方的盟友各助一方。历史约定东门和北门是盟友,西门和南门是盟友。在活动中,对垒双方有自己的图腾标志,西门、南门为龙,东门、北门为虎。四门也称东府、西府、南府、北府。

活动内容及程序。正月初一至初七、八,对垒双方蛮鼓挑战。正月初八至十三,蛮鼓板对征逐表演。正月十四,对垒双方报歪官。正月十四、十五晚,对垒双方分

别出歪官,进行歪官戏表演。正月十六、十七,双方游高照、栽高照。正月十七、十八,双方先后报春官。正月十七、十八至二十一,双方游春官。春官每日早晚在永宁寺高照和佛像前降香两次。正月二十一,作为盟友的双方绑好亭子抬至永宁寺前安放。正月二十二、二十三早晨,双方春官在永宁寺高照和佛像前上香念祭文。双方各耍社火一天。二月初二,双方在永宁寺前各演一天大戏,以谢诸神并卸春官。

活动中所需各种表演或装饰用器材。蛮鼓乐器:堂鼓、盘鼓、铙、大锣、小锣、军号、喇叭。仪仗饰物:旌旗、灯笼、万民伞、大锣、金瓜、钺斧、朝天镫、威风牌(肃静、迴避各一)、轿。其他制品:板对、灯对、高照、亭子、彩门、彩车。其中,灯对子是用木条制成比对联稍大的方框,正面用红纸写对子糊上,两侧和后面糊白纸,中间点蜡烛;再配备一个摺扇形横额,中间点蜡烛,下装长柄以便手举。其他板对每副前都有专人打上金瓜灯笼照明,对联

内容一目了然。高照是伐一株直径 20 厘米以上,高 20 米的杨树,最上端用人造柳絮装饰起来,下边是个方斗子,上口径 120 厘米,下口径 90 厘米,书写“风调雨顺”四个大字(每面一个字)。再下边是个大方斗,上口径 200 厘米,下口径 160 厘米,书写“国泰民安”四个大字。两层斗子,四角都插上各色彩旗,缀上纸花,画上龙和虎(西南画龙,东北画虎)。亭子是先做一个正方形每面 4 米的架子,用 6 米多长的圆木四根,扎在架子四角上,再接四个 6 米多长的圆木,再接四条丈四椽,已经有 15 米高了,再用竹竿扎顶子,出扬角,就超过 15 米了。里边分三层,上层坐玉皇,中层福禄寿三星,下层八仙。外围彩绸围绕,花镜高悬。四角用鳔粘着青器(羊盘、碟子、碗、酒盅)倒悬垂下,长达 3 米以上。顶上系八条大绳,四面八方拽住,防止抬时发生倾斜现象。亭子重量 6000 斤左右,因为太高,上面过重,须在底层再压一个碾盘子镇住,总计约有 8000 斤。抬的时候,每面 8 个大炮杆,共是 32 个

大炮杆,每个大炮杆两个杠子 4 个人,总计 128 个人,每人负担重量约 60 斤。

2007 年 5 月,蒋村正月民俗活动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确定为西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人的洗浴工具



远古的人们,只能到江河湖海洗澡。在洗涤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些泥土抹在手或身上,再用清水洗去,比原来还干净。于是泥土成为最早的清洁剂,当手沾油脂时,用泥土揉搓,再用水清洗,油污很容易去掉。就是现在,我们也用搓泥土来去汽油、柴油、动物的油污。



但是泥土毕竟不能洗涤面部和细嫩部,于是人们从一些颜色发暗红潭水里熬制出结晶体状物质,可以洗去衣物和发际间的污垢。这就是原始的“碱”。碱有很强的去污能力,用于洗涤年代悠远。即使现代人,各种皂类也有碱的成分。

从文字记载看,秦汉时期,人们就用皂角来洗衣物和头发了,到隋唐已形成惯例。皂角是皂荚树的果实,荚果中富有胰皂质可供人们洗衣去污用。在使用前要将整个的荚果砸碎,弄成粉末状或泡在水中,直接用粉末或涂抹皂角水,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皂角是天然植物,对人体无毒副作用,可以洗涤头发等细部。使用皂角水洗涤的头发,干净乌亮,略带芳香味;洗涤的衣物颜色不褪,很受

百姓喜欢。

猪是人类家饲并食用的主要动物,人们利用猪的胰脏加碱,制成最原始的肥皂。猪的胰脏和碱都有很强的去污力,将二者结合,可以缓解碱的刺激力,再掺加一些香料,使气味更适宜。百姓把这样制出的皂叫“猪胰子”,可以制成各种形状,可以清洗身体各个部位,还能润滑皮肤,防止干裂,也是很好的护肤品。

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臣职·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古人也用胰子、皂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里层的屏门,一直来到二堂,官员很可能就在那儿等着客人。但假如主人不想对客人表示出太多礼遇的话,屏门也许就会一直关着,这样的话,拜访者就不得不下轿,跟着仆人走进客厅。而主人往往不一定会等在那。所以这扇门的敞开或关闭暗示着主人是否态度友善或怀有敌意。

所有县级以上衙门都要经过四重门,才能抵达官员居住的那个院落。开在街面上的第一道

门称作头门,第二道是仪门,第三个是带有门的大堂,第四个是宅门。再进去就是屏门,紧

接着是二堂和被称作“花厅”的客厅。

晚清礼仪： 见不见客，门告诉你

晚清时,人们依然严格遵循着种种中国特有的礼仪,比如男女的坐相,街坊邻里见面时作揖打拱,相互拜访时的穿着以及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等等都有讲究。这些礼仪,连西方人有时候也得依葫芦画瓢,照着样子遵循着。

如果按照严格的中国礼仪,西方人拜访清朝官员,应当坐有两三个轿夫抬的轿子去,或是乘当地式样的马车去,而且陪同的仆人要穿长衫和靴子,并头戴饰有流苏的帽子,手捧拜访者的“护片”。在快要到衙门的时候,仆人先赶到前面去向守门人通报主人的到来,并将护片递进去。守门人接过护片之后,便转手交给另一位仆人让后者去通报。拜访者的轿子进了衙门之后,穿过几个院子,在一个紧闭的大门前停下来。拜访者依然坐在由轿夫抬着的轿子上,直到从大门里出来一个仆人,对客人说“请进”。假如主人不想见客,就会借口“不在家”,而让仆人直接对客人说“挡驾”,其原意就是“让马车停下来”。

假如主人确实愿意见客,关闭的大门就会敞开,轿子就会被抬进宅门和更

倘若主人的官衔为道台,拜访者的轿子是不能进入大堂的;若是知府,轿子会停在宅门外面;而有时即使主人的官衔只不过是知县,轿子也不能被抬进屏门。但拜访者的身份有时会打乱所有这些例行的安排。如果客人的身份高贵,或是主人为了表示尊敬,他就会在二堂里等候客人的到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花厅。





毛泽东 给儿子的书单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1941年1月寄出第二批书时，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少年集团，泛指和岸英、岸青一起读书的中国学生。

毛泽东随信附了一张书单，这批书是：《精忠岳传》、《子不语》、《三国志》、《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大众哲学》、《中国历史教程》、《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聊斋志异》、《水浒》、《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

细看这份书单，《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教程》，大概都是当时的中国教科书，可用来补充岸英他们只读苏联教科书的不足。《大众哲学》是书单中唯一的一本政治类书，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这本著作曾反复读过，并和作者当面对讨论过，认为写得通俗易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

古典文学和历史小说在这份书单中占有很大比重，因为毛泽东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

就十分喜爱读这些书。这里的《三国志》恐怕不是陈寿写的纪传体史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精忠岳传》即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洪秀全》即清末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章太炎写有序。《清史演义》，当时流行有三种：陆士铎《清史演义》、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毛泽东寄出的很可能是蔡东藩的。1936年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就是指蔡东藩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子不语》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笔记小说，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十卷，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包括神狐鬼怪、三教九流，长则数千字，短则几十字。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何典》是清乾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英语方言写的讽刺滑稽小说，通篇描绘了阴曹地府里的形形色色的鬼。刘半农于1926年获得四十七年前的印本后，标点刊印，一年之内居然印发了两版。鲁迅对《何典》也非常感兴趣，曾感叹“访而不得”，故刘半农请他写序时，竟在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章，并向日本友人增田涉推荐，被收入日本编印的《世界幽默全集》。

毛泽东向儿子推荐这两部带有“野狐禅”味道的书,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但更令人意外的是,还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小五义》、《续小五义》讲的是“七侠五义”后代的故事。《峨眉剑侠传》类似著名武侠作家还珠楼主写的《蜀山剑侠传》。《侠义江湖》不知是否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或《侠义英雄传》?现在风行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均源于这些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历来遭到正统派人士的贬斥,却在民间广泛流布,迟至近年才引起学界的重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设辟过“武侠小说漫谈”专栏,学者陈平原著有《千年文人侠客梦》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过“新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讲坛。

武侠小说和《岳传》、《三国》、《水浒》、《洪秀全》、《薛刚反唐》等历史小说,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前者多用浪漫笔法,后者多用写实笔法。浪漫的尚武,现实的英雄,构成了这些书的文化主调。而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正恰是充满浪漫气息和英雄气概的。



收容流民的栖流所

从古至今,对流民问题的妥善处理,一直是历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翻开350多年前的历史,清顺治十年(1653年)的北京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收容遣送”机构——栖流所。

清顺治年间,北京刚刚经历明末战火的洗礼,百姓远走他乡、流离失所,饿殍倒毙的惨状在京郊城外更是屡见不鲜。清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北京城建造栖流所,交由当时的五城衙门管理,在中、东、南、北城各设1所,西城设2所,共设6所。

雍正年间,清政府将北京的栖流所交由五城兵马司修葺,各所分雇平民1人,负责看守房屋和照料流民。当时的清政府还规定,各栖流所如遇无所依靠和病卧街头的流民,由各铺总甲送往栖流所收养,每人每日发给小米1升,制钱15文,冬季时还发给棉衣棉被。如果是罹患重症的流民,栖流所还必须医治施药;倒毙街头或病故所中的流民则施给棺木,掩埋于义冢。北京各家栖流所的经费由户部统一调拨,据文献记载,每年各城的栖流所耗费的白银200两,五城合计多达1000两。如还尚有不足,朝廷准栖流所向户部再领,

年终将经费收支情况造册上报户部查验。清嘉庆年间后,流民日渐增多,原有经费入不敷出,清政府遂将京城栖流所每年的经费增至2600两。直到清朝灭亡的前夕,这项经费的开支仍未废除。

北京的栖流所,首开全国之先河,属于官办的救助机构,它的职能主要在于3个方面:一是收养无依无靠的流民;二是为患病流民提供医疗救助;三是掩埋亡故的流民。“首善之区”所设的栖流所,无疑给全国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后,各地纷纷开设栖流所,收养流民。

南方所设的栖流所大多是官商共建的,因而其功能也有所不同。它既要承担民间流民收养的重责,也要承担政府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大体可分以下3类:

第一,安置军流犯人的栖流所。浙江瑞安县的栖流所就属于此类。据《嘉庆瑞安县志》所载,瑞安县曾建有两座栖流所。一座位于城东北隅,共有15座舍间;另一座位于城西北隅,共有18座舍间,两座栖流所均是用于安置军流要犯所设。

第二,收养灾民的栖流所。清乾隆年间,因北方突遇大水,南渡淮河逃荒的灾民络绎不绝。为了救助灾民,江苏淮安府山阳县知县在城中修葺房屋4舍,每舍各3间,冠名栖流所,以收养北

方灾民。乾隆十二年秋,江苏沿海因飓风引发潮灾,“江淮民间田庐多漂没,流民颠沛道路者相望”,淮安知府与山阳、桃源两县县令一道,在淮安府境内分设栖流所8处,给流民提供宿食,并赠与医药,救助灾民达万余人。

其三,收养病茕的栖流所。除突发的灾民外,尚有部分因孤身行旅、病卧路途而无人理会者。对于这些流民,地方政府也建立相应的栖流所进行收治。清嘉庆年间,上海嘉定县南翔镇与宝山县罗店镇所设的栖流所就是专门收养这类人员的。

晚清至民国年间,社会历经大的变迁和动荡,但栖流所仍旧受到热心慈善家的支持。有的栖流所接受当地绅商的支持而继续发挥慈善机构的职责;有的则受到西方影响,蜕变成医院等现代公共机构。

建国后,政府对原有的栖流所进行改造,主要收容旧社会遗留的黑帮、妓女及无业人员,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帮助他们学习技艺并重新踏入社会。此后,伴随着户口制度的建立,栖流所逐步成为收容遣送站,主要收容异地行乞人员及外来盲流,等到当地民政部门寻找到其家属及所属单位后,就由当地的主管部门负责遣送回原籍。直到2003年,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后,收容遣送站的职责才逐步转变为“救助管理”职能。

“三顾茅庐” 与 “荆楚人贵”

历史上，“三顾茅庐”的故事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千古美谈。正是有了这“三顾”，才有了蜀汉政权，并直接促成了“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它堪称中外用贤史上的大手笔，刘备的用人胆识令人叹为观止。可是蜀国在三国之中却最先灭亡，究其根源，又恰恰因为刘备入川后用人的狭隘性与其“三顾茅庐”时判若两人，所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益州人才不为所用，致使孔明虽六出祁山，终难酬一统天下之壮志。

三国时代人才济济，群星璀璨。三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出色的人才，谁最能够延揽并正确使用人才，谁就能够在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的较量中赢得优势，夺取成功的桂冠。

刘备自桃园结义，转战各处，始终落

魄不已，狼狈不堪。在屡起屡败又屡败屡起的境遇中，他终于意识到拥有“经纶济世之才”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家的远大抱负和战略家的宽阔胸襟使他一旦发现诸葛亮这样的关键性人才，便倾心相求，竭诚相待，并发自内心地赞叹自己“如鱼得水”。在这“三顾”中，刘备可以说是真正地解放了思想，勇敢地打破了身份界限、年龄差别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当时默默无闻的诸葛亮倾心垂慕，才使得孔明“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从而“鞠躬尽瘁”地支撑了两代刘氏王朝。可以说，刘备的最大成就和本领既不是创建了蜀国基业，也不是韬光养晦的高深谋略，而是他发现并起用了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人才。

然而，在建立了蜀汉政权后，刘备等人顿失“五湖四海”的胆识和胸襟，在蜀国统治阶层中，占主导的是刘备从荆楚带来的人士，“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其次是刘璋留下的东州之士，最后才是益州的本地人才。经过多年



●文史拾趣●

的战争,荆州和东州之士消耗很大,可是,刘备等人却认为益州人士排外心理强烈,深恐他们借机发展势力,难于控制,因此对益州人士虽使用但不敢大胆选拔重用。《三国志·蜀书》所记载,把持蜀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几乎全是外来的荆楚和东州之士。而益州人绝对进不了决策圈,只能充当徒有虚名的大夫或中层职官而已。由此看来,不是蜀国没有人才,而是刘备等人不敢放手使用。这就使诸葛亮及其继任者选拔使用人才的范围越来越小,孔明后来竟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以至在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后,蜀汉政权中几乎再也没有真正能领兵打仗的人了。

历史的兴衰一再证明,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荐贤举能,选贤任能,历来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人才难得,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帅才更难得。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为政之本在于任贤,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准之一。”纵观刘备用人之得失,在于他仍未能摆脱“败则求贤若渴,胜则心存疑忌”,“创业时放手任驰骋,守业时束缚使驯顺”的局限性,从而由辉煌的事业巅峰跌入失败的谷底,可悲地重蹈了历史的覆辙。刘备用才的得失教训,值得后人深思慎取。



蒲松龄“晒书”

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另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

蒲松龄的家乡有一个乡绅,附庸风雅,家中藏书万卷,但却从来不读。有一年夏天,他家里的书霉烂,便在场院里晒起书来。蒲松龄恰巧经过那里,见到如此多霉烂的书,感慨万千,便在书旁躺下,敞怀闭目,晒起太阳来。乡绅不解地问他干什么,蒲松龄笑着说:“我也在晒书呢!”“你的书在哪里?”蒲松龄连眼也不睁,摸着肚皮说:“我的书都装在这里面。”那人听了知道蒲松龄在嘲笑他,只好羞愧地走开了。

这些古人姓什么

孟姜女 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演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俞伯牙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俞伯牙姓什么？姓伯。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高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少善听音，故曰为世无足为鼓琴也。”王昕《漫说“三言”“二拍”》：“‘伯’是姓，‘牙’是名，或者也写作‘雅’；‘钟’是姓，‘期’是名，‘子’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伯牙、钟期，而非俞伯牙、钟子期。”

柳下惠 以“坐怀不乱”著称的柳下惠，曾担任鲁国的大夫。柳下惠本姓展。《辞海》载：“柳下惠，即展禽。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惠。”

叶公 “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习过，叶公本姓沈，叫沈诸梁，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全唐诗》

中收有著名诗人李百药的作品《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

周公 《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姓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名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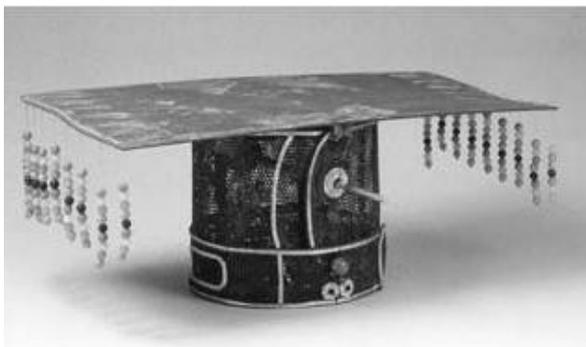
褒姒 “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姓姒。因其为褒人所献，故名褒姒。《辞海》载：“褒姒，褒国（今陕西勉县东）人，姒姓。”

鲁班 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公输。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

商鞅 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

郑和 郑和下西洋为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姓什么？姓马。《辞海》载：“郑和，明宦官，航海家。本姓马，原名文和，小字三保。回族，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

弈秋 《弈秋》是《孟子》中的名篇。弈秋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围棋高手，并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围棋教育的名人。弈秋姓什么？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孟子正义》里作有说明：“古之以技传者，每称之为名，如医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弈秋，故知秋为其名，因通国皆谓之善弈，故以弈加名称之。”《通志·氏族略》中写道：“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弈秋的姓氏已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由此想到像医和、卜徒父、庖丁、优孟等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在各自所从事的职业或具有的专长之后加上名所构成。



有句成语叫做“冠冕堂皇”，这冠和冕就是古代帝王或官员戴的礼帽。史载，黄帝始创冠冕，可见帽子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帽子主要是当作装饰品，它不像后世的帽子那样把头全盖住，而是只有狭窄的冠梁，遮头的一部分，两旁用丝带在额下打结固定。古代男子20岁开始戴冠，要举行冠礼，表示进入成年。至今在闽南和台湾，男子的成人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戴一顶新帽子。

在古代，帽子曾经是权力等级的象征。汉朝时，天子戴的是九寸高“通天冠”，太子戴的是七寸高“远游冠”，乐师戴的是“方山冠”……“冕”的出现比“冠”要早，它前低后高，前方用丝线垂面，使目不斜视，两旁用丝线避耳，表示不听谗言。一般只有皇子继承皇位时

帽子的历史

才能加“冕”。所以“冕旒”成了帝王的代称。

现代人们以脱帽表示礼貌，但在古代却是失礼的举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酒醉后竟“脱帽露顶王公前”，是有失体统的。

说到帽子，自然要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乌纱帽”，作为权贵“头衣”的乌纱帽始于隋朝，并以帽上饰玉多寡区别官职大小。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议事时期大臣交头接耳，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颤动。乌纱帽上装饰有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皇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朱元璋定都南京三年后作出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成为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

如今，各式帽子还是识别民族和行业的标志。蒙古族喜欢戴狐皮帽，土族爱戴织锦帽，新疆和田维吾尔族妇女戴的是小花帽，直径仅十厘米，堪称迷你帽。江南颇具特色的是乌毡帽，它能冬经风雪夏遮阳，农民渔民四季都喜欢戴。儿童戴兔子帽、虎头帽，一般都与本年属相有关，有的还惯戴戏帽，上绣“长命富贵”字样。20世纪初，欧美的传统礼帽传入我国，开始只用于婚庆节日，后来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澹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一生著书 320

王夫之“嫁书”



卷。

有一年,他的大女儿出嫁,人们都来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女儿办什么嫁妆。王夫之高兴地拎来箱子,说嫁妆都备齐了。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满满两箱书。王夫之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以书为嫁妆,是对知识的尊重。



茹志鹃『煮书』

王安忆也是当代著名女作家。

在茹志鹃的书房中高挂着一条幅,上面赫然写着“煮书”两个大字。她对此解释道:“光看书不行。只看个故事情节,等于囫圇吞枣。应该读,读就仔细多了。然而读还不够,进而要‘煮’,‘煮’得烂熟,透彻,这不是一遍、两遍可完成的。”“看读煮”,茹志鹃以切身体会、深切体验,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读书过程,展示把书读“活”的过程。

茹志鹃(1925~1998年),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茹志鹃的女儿





华罗庚“猜书”

华罗庚(1910~1985年),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等。

自学成才的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每当他拿到一本新书时,首先不是按部就班去读,而是对着书本闭目静思一会儿,猜想书的大致内容、布局谋篇等。斟酌完毕后才打开书。如果发现作者的思路及所写的内容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做“书的奴隶”,这不仅节省了他的大量宝贵时间,而且培养了他敏锐的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老子的 做人做事做官思想

一、大气做人

1.立身淳厚,抛弃虚华。老子首先提出了要大气做人。“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三十八章》)可以概括为:处厚不薄,处实不华,意为抱朴守拙。即保持和坚守自己纯真朴实、鲁直憨厚的本性。总之,做人要不世故,不圆滑。

2.“谦下”,学江海为“百谷之王”。老子认为,大气做人,就应该向“江海”学习。为什么呢?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大小河流的总汇处,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所以成为百谷之王;圣人之所以成为天下人心所向,也是因为对民众卑下自处,“谦下”而不高高在上,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天下的人拥护他。正是因为圣人没有和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不与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3.上善若水。老子提倡,为人处世要向水的“柔弱”品质学习。他认为,最高尚的品德就像水一样:守柔、不争、处下。“柔弱胜刚强”是老子最为著名的一个哲学命题。“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

4.曲则全,枉则正。老子还认为,大气做人,要受得住委屈,经得起冤枉。他说:受得住委屈,才能保全自己;经得起冤枉,事理才能得到伸直、纠正。“曲则全,枉则正。”(《老子·二十二章》)同

时，还要以德报怨，这样才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彻底消除嫌怨。事实上，以德报怨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二、小细作事

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老子认为，宇宙中一切大的事物无不从细小的事物发展而来。因此，干大事必须从细微的小事做起。“大小，多少。困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六十三章》）

1. 成就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在这里，老子形象地说明了大小这对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在认识论上充满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唯物辩证法思维。

2. 持之以恒，目标始终如一。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六十四章》）我国明朝的李时珍是世界级水平的伟大药学家，他的名著《本草纲目》，先后被译成英、法、俄等十余种文字，成为国际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药典。这部巨著用了 27 年的时间，三次改写，才最后成书。

3. 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老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事业，一是要反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二是要力戒逞强、逞能、逞勇。不固执己见，就能把事物看得分明；不自以为是，就能把是非判断清楚；不自我夸耀，事业才能有成就；不自高自大，才能担当领导。“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二章》）

4. “贵身”，生命高于一切。老子提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这是说，以爱护自己身体的态度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给他；以爱护自己身体的信念来对



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老子和庄子都认为：“重生者则轻利，重利者则轻生。”轻生的人必然追逐名利，弃身而殉物。这种身且不能安保的人，怎么能治理天下呢？

三、廉洁为官

老子认为，从政做官必须与众不同，首先应着重提高品德修养这个做人的根本。

1. 领导者自律——“不欲以静，天下自正”。老子认为，当官的根绝了私欲，社会就自然会风气良好。“不欲以静，天下自正”八个字精辟地道出了为官者节制个人欲望的社会意义。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但他一生廉洁奉公，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私谋过任何特权，真正实现并承诺了“天下为公”的誓言。

2. “圣人不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老子从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名士的人格高度，提出的理想人格要求。老子认为，缤纷的物欲世界使人目盲，靡靡的音乐使人思想麻木，鲜美的滋味使人每天想念，纵马打猎行乐使人心性浮躁

●文史拾趣●

发狂,稀有难得的货物使人行行为不轨。所以,老子提倡,“圣人”不要多积蓄,自己的财富要用来济众,完全为人民;给予别人越多,自己越感富足充裕。

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司马光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还教育后人崇尚俭约,提醒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希望他绝不可因奢侈而“败家丧身”。

3. 私欲是罪恶之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要顺其自然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他不主张去欲、无欲、绝欲。但是,对于自然之外的人为欲望,即人们常说的身外之物,如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之欲,就必须减少到最低程度,根绝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安静的地步。老子高度概括了人与财物名利的辩证关系:“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古往今来,多少贪夫殉财,不知足,

不知止,栽进了罪恶的泥潭。

4. 推功揽过——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能受国之垢,乃天下王。”如前所说,老子认为最高尚品德的人应该像水一样,永远处下,有时处在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最脏污的地方。推及领导者呢?就应该能够承担国家遭受屈辱和灾祸的责任,这才是社稷的主人,这才叫国家的君王。“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老子·七十八章》)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推功揽过。西汉名将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兵北击匈奴,参加漠北战役。由于李广指挥的东路军没有向导迷了路而未能如期参加漠北会战。战后,责令李广的部下来对质受审。李广挺身而出,为部下揽过自责,他说:“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东汉名将冯异的品德更是在中国历史上传为佳话。冯异驰骋沙场十几年,战功累累,但每次战役结束后,诸将并坐论功时,他为了避功,常常一个人独自坐在大树底下读书思过,为牺牲的战友、士兵深感难过。因而,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



名片始于汉朝

名片的历史久远,古已有之。汉朝时,人们就削竹为简,将自己的姓名写于竹上,这种写有姓名的竹简,当时称为“刺”,因竹简携带不方便,后来便改用为纸,称为“名纸”。据《留青杂札》载:“古者削竹以书姓名,故曰刺。后以纸书,谓之名纸。”据《山堂肆考》中有这样的记述:“名纸谓写名于纸上也,今呼名帖。”





古代文人的 食谱

中国古代的食谱大多不是厨师所撰，而是文人作品。文人对很多菜式加以乱想，有时候是说得好听，但实际在操作上有着种种不便。比如《清异录》里抄了份唐代韦巨源的《烧尾食单》，是当时韦巨源升官之后请皇帝吃的一顿饭，其中包括了用羊骨脂拌的小牛肉香肠，叫做“通花软牛肠”；用蟹黄蟹膏蟹肉制成的切开呈现黄白相间的煎糕，叫做“金银夹花平截”；用鱼白和各种河鲜蒸的鸡蛋羹，叫做“凤凰胎”。

文人兼任美食家，所以有时候，有的菜谱很不“靠谱”。比如，《筵款丰馐依样调鼎新录》（后简称《调鼎新录》）这本书，原是一个手抄本，署为“同治五年（1866年）丙寅岁季冬月朔五日，程记录”，共收录了2500种川菜品种。可是整本书是用诗词写成的菜谱，雅得不行，但到头来，究竟是用什么油盐酱醋做的，通通没说明白，想来不是作者故意藏着掖着，而是他自己根本没去过锅台。

而真的有水准的文人菜谱则比较少，其中的佼佼者有元代倪瓒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倪瓒（1301~1374年），字元镇，号云林。元末著名画家，擅长以水墨画江南景色，在美术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倪瓒生于江苏无锡城东南约10公里的梅里祇陀村，家本豪富，因元末农民起义故散其家产，自带家眷乘舟往来于太湖和三泖之间，过着隐居生活，生平未曾出仕。倪瓒旧家本有一堂名“云林堂”，就用此堂命名他所编著的这本菜谱为《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集中收有50余种菜点和饮料的材料和制作法，其中有不少菜如“烧鹅”、“青虾卷”、“川猪头”、“新法蟹”、“雪庵菜”等，都独具风味，颇为后世称道。有些菜肴的制法一直传到现在，甚至传到日本。《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烹饪专著，对我们研究中国烹饪史和认识元代苏南地区的饮食风貌，大有借鉴作用。

石显，汉元帝时期的佞臣，大权独揽，胡作非为。他害怕有朝一日失宠后，自己得罪过的同僚和部下会打自己的小报告。于是，就想出一个法子，要验证一下。

石显经常加班加点，要很晚才能下班。当时12点关门是一个制度。以石显的权力，让守门人开门是不成问题的。其实，很长时间以来，石显也是这么做的。可是，石显杀鸡用牛刀，一定要从皇上那儿要一张通行证，得到皇上的亲口允诺：“准了。”石显拿到口谕，就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晚上，依然是深夜出宫，远远地就大声吆喝着：“奉旨，把门打开！”门，自然是打开了的。当然，小报告第二天也打到皇上那儿了：“石显假传圣旨，夜开宫门，是欺君，陛下得杀他的头！”没想到，皇上淡淡地说：“这事我知道。”事后，皇上还把这事告诉了石显。石显趁机诉苦道：“陛下你太心疼小的了，让



石显专权

许多大臣嫉妒，他们想方设法要陷害我，我就是再小心，再辛苦，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啊！还是请陛下让我到后宫打扫卫生吧，我保证身在后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皇上觉得石显怪可怜的，更加喜欢他了。这样，石显的政敌害怕了，再也不敢打石显的小报告了。有了皇上这块挡箭牌，石显更

加肆无忌惮。当然，最后石显还是倒霉了，被贬官，在流放边境的路上气死了。

我们忽然发现，这个石显是在学赵高的样儿。当年赵高指鹿为马，石显则反其道而行之。有些人常常是抓住一个自己被“冤枉”的小事大做文章，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以此掩盖更多的错误和罪恶。高高在上的领导则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一次顶一万次，对部下百分之百的信任，还美其名曰“用人不疑”，于是，奸臣小人就大行其道了。

《西安年鉴》2009 卷获全国年鉴大奖

2009年12月,在苏州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结果揭晓。《西安年鉴》2009卷以其翔实的内容、精美的装帧脱颖而出,获得地方综合年鉴城市类特等奖。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是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年鉴研究会承办的全国性年鉴质量评比活动,每5年评比一次,是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此次,参评的城市年鉴共227部,《西安年鉴》(2009)除获地方综合年鉴城市类特等奖外,还获得框架设计、条目编写特等奖和装帧设计一等奖等3个单项奖。这是继1999年、

2004年之后,《西安年鉴》第三次获此项殊荣,而且单项奖项之多,排序之靠前,均创历史最好成绩,显示了《西安年鉴》在全国年鉴界较高的地位和较高的编纂质量。

《西安年鉴》创刊于1993年,现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国内外公开发行,是西安市唯一全面记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大型综合性信息资料性年刊。到2009年为止,《西安年鉴》已连续出版17卷,成为西安重要的信息库和资料工具书,不仅是西安文化建设的精品,也是全国城市年鉴的品牌。

·解字·

“一”



李白的《蜀道难》中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一”字就是最小的自然数。图中①是甲骨文的形体,②是金文的形体,③是小篆的形体,④是楷书的形体。这四种形体是一脉相承的。

“一”字讲法很多,主要有这样几种:当最少的整数用,比如一人、一马、一枪、一刀等。也可当“专一”讲,如“专心一意”。也可以当“都”讲,比如《荀子·劝学》:“一可以为法则。”也就是“都可以为法则”的意思。有时还可以当无定代词“或”讲,如

《孙子·谋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这个“一胜一负”,你若理解为“一个胜一个负”那就不妥当了,而是“或胜或负”的意思。杜甫在《石壕吏》诗中有这样两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个“一”字怎样解释呢?实际上这个“一”被借为语助词用了,没有实在意思,只是起着加强语气的作用。

“一”字是个部首字。在汉字的楷书中从“一”字的字很多,比如:“丁”、“上”、“下”、“丘”、“世”、“亚”、“西”、“至”等等。



《西安年鉴(2010)》编纂工作暨培训会召开

2010年3月11日,《西安年鉴(2010)》编纂工作暨培训会召开,来自全市各区县,市直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及省属驻市单位的100多名主笔及撰稿人员参加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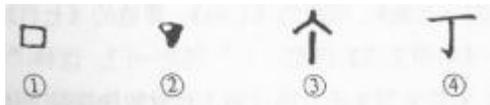
会议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西安年鉴》主编孙亚伟主持,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小六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年鉴》常务副主编姚敏杰对《西安年鉴》2009卷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年鉴条目规范、内容选材等情况进行了培训。市地方志办公室纪检组长、《西安年鉴》副主编任昆明进行了总结发言。会议期间,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卫生局、团市委等2009年度年鉴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介绍了各自的工作经验和好的做法。参加会议的各单位主笔和撰稿人员对《西安年鉴》2009卷在第四届全国年鉴质量评比中获得特等奖表示祝贺,这为西安争得了荣誉,也是全体参与者的荣耀,与《西安年鉴》这些年坚持不懈注重质量,不断加强业务培训是分不开的。与会者希望《西安年鉴》在不断加强培训的同时,组织大家走出西安,放眼全国,多与全国同行交流学习,进一步提高《西安年鉴》的知名度、美誉度。同时,大家也对《西安年鉴》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解字·

“丁”

有的人谦虚地说:“我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用“目不识丁”这个成语表明自己的学问很低,连只有两笔的“丁”字都不认得。图中①是甲骨文的形体,就是一个方口,这是从上面往下看,钉子的头是方形的。②是金文的形体,像钉子侧视的样子,上部大是钉子头,下部小是钉子尖,真有点秃钉子的样子。③是小篆的形体,上部不大像钉子头了。④是楷书的形体,把小篆上部的“人”字形拉平,变成了一横。可见“丁”字的本义就是今天的“钉”,是个象形字。后来因为读音的关系,所以就被假借为天干的第四位,即“甲乙丙丁……”中的“丁”了。那么原当“钉子”讲的“丁”怎么办呢?这就只好在其左边加上个金字旁,表示钉子是用金属做的,写为“钉”,从象形字变成了左形(金)右声(丁)的新形声字了。

钉子是金属做的,所以坚硬,这就引申为健壮义,如王充《论衡·无形》:“齿落复生,身气丁强。”再引申一步即指成年男子为“丁”,如白居易说:“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新丰折臂翁》)这里的“丁”就是指成年男子。解放前国民党抓兵,亦称为“捉壮丁”。



巡抚与总督

总督、巡抚是明清时期地方的军、政首长。总督的地位声望略高于巡抚。但就其设置而言，却是先有巡抚，后有总督。

巡抚之名，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后来每年都要派中央官员巡抚地方。这一时期，“巡抚”的性质同于“钦差”，

本身不是官名，没有品级。清代康熙（1662~1722年）以后，全国除直隶、四川外，每省都设巡抚，规定巡抚品级。至此，巡抚才正式成为地方官，但仍遵行旧的兼衔制。

战乱时期，各地巡抚互不统属，往往贻误军机。为统一调度、指挥军队，以利战事，就设立了专管军事的总督。总督性质同于前期的

巡抚，兼衔一样，也不常置。自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常设两广总督以后，才开始了正规的跨省总督制。从此，总督职权日益扩大，并兼掌民政，实际上成为地方军政首长。但其获得品级，正式成为地方官，也是清康熙以后的事。其时，全国共设直隶、四川、两江、湖广、闽浙、两广、云贵、陕甘八员总督。东三省总督为清末设置。

我国封建官制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中央监察官容易演变为地方军政首长。这是因为，历代封建王朝为强化中央集权，经常派出中央监察官巡视地方，这些官员代表皇帝，挟制地方，逐渐夺地方军政大权。如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都是由中央监察官演变为地方军政首长的。巡抚、总督由中央监察官演变为地方军政首长，则是这一特点在明清官制中的反映。



“靠右行”始于何时

受到了英、日等国的影响。1946年前，汽车及各种人力车、畜力车在较长时期实行了靠左行驶。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式汽车大量进口，其方向盘及灯光安置，均适用于美国车辆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如果要使这种

种车辆适用于当时靠左行驶的交通规则，必须进行车辆改装，改装费需增加车价的1/5。因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做出决定，自1946年1月1日零时起，全国一律实行车辆靠右行驶。

我国车辆靠右行驶早在唐代已经施行。制定这项规则的是唐代初年的大臣马周。据《隋唐嘉话》记载：“中书令马周，所陈世事，莫不施行。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马周）法也。”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外国多次侵略，道路交通也

清朝名字 之谜

皇太极把国号改金为清是为什么?清的意思又是什么?学界、清史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皇太极自己没有做解释,清朝的《太宗皇帝实录》、《满文老档》,都没有做解释,于是后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诠释,于是有了故事。说努尔哈赤当时逃难骑匹大青马,他跑得很急,把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对马很有感情,对马就说,大青啊,大青啊,你是为我累死的,将来我得了天下,我这个国号就叫大青,“清”跟“青”是谐音,这只是一个传说。除了这个故事外,至少还有五种诠释:

第一,有人从音韵学上来解释,清和金在满语里音相近,所以用清。

第二,有人从历史上来解释,说中国这么多朝代没有一个用清的,怕重复,所以用清。

第三,也有人从阴阳五行上来解

释,明朝的明,左面是个日字,日是火,清左面是三点水,水克火,所以清要灭明,他用清。

第四,有人从萨满文化去解释,清就是青,两字同音,青天是通天,吉祥。

第五,有人从民族方面解释,说他原来用后金,但要进兵中原,中原一提出这个“金”就想起南宋了。一提起金人,就想起岳飞了。皇太极进兵中原要减少阻力,就不用这个“金”字,改用清字。

这五种解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

皇太极原来的年号是叫天聪,改为崇德。当时明朝的年号叫崇祯,都带崇字,崇祯的祯字左边是示部,右边一个贞,示就是神,神字左边就是示部,所以崇祯皇帝是重天、重神。皇太极改成崇德,德字左边是双立人,就是重人。

崇祯的祯右边是贞,占卜用的贞也同神相联系,崇德的德字,右边是直心,说的是心要直,心要正。皇太极改天聪为崇德,崇的是人事、是民事。

皇太极改国号金为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表明皇太极具有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也具有改革家的改制与维新,是清朝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台湾最早叫什么



中国历代典籍中时台湾名称的记载，非常久远。《尚书·禹贡》称台湾为岛夷；《史记》称为“瀛洲”；《后汉书》称为“东夷”；《三国志》谓之“夷洲”；唐、宋、元诸代一般称其为“流求”或“琉球”。直至明朝后期方出现“台湾”这一称谓。关于台湾名称的由来，国内外有 3 种意见：

1.认为“台湾”名称起源于荷兰人 1624 年占领台湾之后，修筑楼台于海水入湾处所致。

2.认为“台湾”之称是由“大湾”一名转化而来。大湾，得之于安平(今台南西安平镇)的大海湾，道光二年后由于海水的作用，完全陆化。在“大湾”未陆化之前，明人陈第写的《东番记》中称之为“大员”。

3.认为远在明中叶前，原安平地方，有一个土著民族称为台窝湾族，因此安平地区就以这个部落之名称呼。后来由于习惯的演变和官府的正式命名，台湾全岛遂称为“台湾”。这种看法既有史料根据，又有实地调查的依托，较能自圆其说。

“墨守”与“成规”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力倡“兼爱”、“非攻”。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家攻伐不已，一味主张“非攻”的墨家，其处境就非常艰难，因为你可以不攻别人，但别人攻你怎么办？在这样的特殊复杂背景下，墨家弟子就专门研究在别人进攻之时如何防守，最终将“防守技术”推向了极致。墨家子弟替宋国守城，就是墨家防守能力的有力佐证。

据《墨子》记载，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专门用来攻城的云梯，并且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此事之后，昼夜兼程，赶到郢都游说公输盘，见公输盘不为所动，墨子只好当场和他一较高下，史载：“公输盘久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

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拒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止楚攻宋”。自恃掌握了攻城技术的公输盘，最后却在墨子面前败下阵来。墨子以其技高一筹的防守，终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此“墨守”，亦即“墨家的防守”，就广为世人所推崇。同时，在诸子百家之中，墨家内部等级和制度最为森严，“墨者必须绝对服从之”，此乃“成规”之谓也。

“墨守”和“成规”本来是当时人们对于墨家两大特点的概括，最后却被历史组合成了一个带有某些贬义的成语——墨守成规。



什么是真正的“吃素”

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的部分僧人可以吃肉，而汉传佛教却不允许吃肉？

原始的佛教，僧人是不做饭的，吃饭都是沿街乞食。既然是乞食，那么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人家给你肉，你也得吃。佛陀说，出去乞食，一是为了维持生计，二是为了和众生结缘。所以小乘佛教僧人吃肉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没有“贪”念，所以，心是清净的，心清净则是心素。

藏传佛教僧人吃肉的原因不是因为乞食，而是气候恶劣，没有蔬菜和水果，只能用肉食来果腹，同样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所以，心也是清净的。而且现在很多藏传佛教的高僧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在提倡素食。

汉传佛教吃素是梁武帝提出来的，原因

是不忍杀戮众生，吃素乃是为了培养慈悲心。所以真正的修行者，连那些取着荤名的素食都不会去吃，认为其中充满了满足口腹之欲的贪心，有贪心在，吃什么都是荤。

由此可见，佛教讲的“素”，实际是指“清净”，而不是物质上的“素”那么简单，心法还是需要在心地上做功夫的。



中国用红色表示吉祥的典故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中国特别偏爱红色，红色意味着吉祥。每逢节日庆典或操办喜事，人们总要张灯结彩，来个“满堂红”，以表示喜庆、吉祥。其实，中国早期并不是用红色表示吉庆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用黄色代表吉庆，也曾用过黑色和白色代表吉

庆。到了汉朝，汉高祖称自己是“赤帝之子”。“赤”就是红色，从那时起，红色就成了人们崇尚的颜色。汉朝以后，我国各地崇尚红色的风俗已基本趋于一致，并一直沿袭下来。于是，红色就成了我国人民表示喜庆、吉祥的颜色。黄色，则表示尊贵，成为皇家用色的象征。



然后冲入适量沸水,用勺匙“吃”下去。

茶圣陆羽对这种吃法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么多的调料破坏了茶的本味,简直是恶水!他支起一个特制的鼎炉,取山中、江中“活水”烹茶。烧水很有讲究,不能过于沸腾,否则水就“老”了,既影响健康又影响茶味。茶叶末按人数多少定量放入,煮到火候即止,让茶叶中的精华充分解析出来。放入少许盐,均分精华而饮。陆羽之法得到认可和推广,但传统之法仍有市场,现在西北、内蒙古一些少数民族喝茶时仍放盐、花椒,有的还加入奶或酥油。

唐人怎么“吃”茶

茶,在唐代不是喝,而是“吃”的。把茶冲泡后喝下去的方法大概时兴于明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茶具让我们能窥知唐人“吃茶”的大致情况。

茶叶当时有现采摘就炮制而“吃”的,也有制成团块干茶供茶季过后使用的。茶拿来后先要烘烤,待其干燥后放在茶碾子里碾碎成末,用茶罗罗过,细末收在储茶的盒子中待用。水烧开后,先取定量茶末,用少许水在茶碗中搅拌成糊状,再加进盐、椒、姜、胡麻等调料,



五黄餐与屠苏酒

所谓五黄餐,就是把五种黄色食物混在一起吃,尤其在端午节的中午吃最佳。

因为中医理论认为,端午节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可利用端午节节气的力量,抑制霉运、提升自己的精力。

那么,吃哪五种黄色食物呢?如黄鱼、黄瓜、蛋黄、黄豆、黄花菜等。

易经术数认为,黄色可以解毒、制煞,还可增加自己的阳气、财气、精力。因此,常吃五黄餐可使得自己精力充沛,斗志高昂。

此外,还有一种酒也可有回复体力的效果,就是屠苏酒。饮屠苏酒是我国过年的一种风俗。饮屠苏酒,意为屠绝鬼气,苏醒人魂。据说于大年初一早上喝此酒,可保一年不生病,以后便将春节喝的酒统称屠苏酒。

据唐朝人韩鄂所著《岁华纪丽》的

记载,屠苏是一间草庵(茅舍)的名称。据说古时住在此草庵的一个名医,每到年夜便分送给附近每家一包草药,嘱咐他们放在布袋里缝好,投在井里,到元旦那天汲取井水,和着酒杯里的酒,每人各饮一杯,这样一年中就不会得瘟疫。人们得了这个药方,却不知道这位神医的姓名,就只好用草庵的名称“屠苏”来命名这种药酒。

至于屠苏酒中放的什么药,按梁朝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北魏的议郎董勋说过,古代民间风俗元旦那天所喝的药酒,里面放的是花椒焙成的药末。所谓屠苏酒,其实是一种椒酒。董勋还谈到饮屠苏酒的习惯,是一家人中年纪最小的先喝,依次挨下来,年纪越大的越后喝。原因是小孩过年增加了一岁,所以大家要祝贺他;而老年人过年则是生命又少了一岁,拖一点时间后喝,含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这种先少后长喝屠苏酒的风俗一直传到后代。

何谓“高足”

“高足”最初的意思是指良马、骏马。汉代的驿站里备有三等马,分别为高足、中足、下足,高足就是上等快马。后来,逐渐演变为指人的才能高。《世

说新语·文学》记有郑玄与马融之事:“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这里的高足弟子即指才能高、成绩好的弟子。以后,又由此意演变为指别人才能高的门生。再后来,就尊称别人的门生了。

如何提高人口志记述深度的一点思考

在首轮志书中,人口志记述的内容主要有:人口总量(包括总户数、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人口分布(包括地区分布、城乡分布);人口变动(包括自然变动、人口迁徙);人口结构(包括年龄、职业、文化、民族的构成)。这些记述都侧重于从人口的规模、数量上进行分类记述。有些志书虽然记述了人口素质内容(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但往往也只反映某一方面,总体还记得不够完整和深刻;未能从人口的数量与素质变化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关系上进行记述。如今在第二轮修志中,若继续沿用首轮修志的思路,就不能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问题的新特点浓墨重彩地反映出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价值。因此,要提高人口志记述的深度,就必须在完整准确记述人口规模、数量的基础上,抓住人口问题加以分析研究,全面地揭示人口数量和质量变化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要注意把握近年来人口问题的新特点,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将其充分地反映。在撰写人口志时应重点把握以下问题:一是流动人口问题;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三是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四是资源承载力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问题。同时,人口问题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现象,因此在编写人口志时必须广泛搜集资料,要充分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同时还必须选取适当的角度来撰写,避免与其他分志的重复交叉。总之,编修人口志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准确深刻地反映时代特点,尽可能地把人口的状况记述得更加完整、丰满、深入,使之能真正地反映出人口问题的本质属性,揭示出人口的社会意义。要做到这一点,修志者思想观念一定要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一定要深入研究第二轮志书记述内容的新发展,多侧面多角度地捕捉时代新亮点。(本文摘自《中国地方志》)